

现代艺术 与传播

Journal of Modern Art
and Communication

现代艺术与传播

第 1 卷第 1 期 (2026)

期次	卷 1 期 1 (2026): 2026 第 1 卷第 1 期
出版日期	2026-06-28
期刊网址	https://www.bsjn.com/jmac/zh_Hans
联系方式	主编 <jmac-editor@bsjn.com>

编辑委员会

编委

璐 刘 江苏省扬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超 张

目 录

文章

◎ 《罗小黑战记》：空间叙事中的生态隐喻与个体成长	
玲姜生 张, 少鹏 陈	1
◎ 人工智能辅助下的喜剧角色塑造：技术与创意的融合	
旻凯 李	7
◎ 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冲绳导演高岭刚影像中的空间记忆与抵抗诗学	
继豪 国, 超 张	11
◎ 主流媒体赋能青年人才留驻的场景化创新实践	
——以扬州电台江都广播“青春交友”IP2.0 升级迭代为例	
婧 周	16
◎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实践路径与价值升维	
——基于扬州新闻广播四篇民生监督报道的案例分析	
双双 周	20

引用本文：玲姜生 张, 少鹏 陈. 《罗小黑战记》：空间叙事中的生态隐喻与个体成长[J]. 现代艺术与传播, 2026, 1(1): 1-6.

收稿日期：2026-06-29

《罗小黑战记》：空间叙事中的生态隐喻与个体成长

玲姜生 张, 少鹏 陈

摘要：《罗小黑战记》作为一部二维作画的动画电影，有意地将空间作为一种能动的叙事道具融入动画电影叙事，深化了片中的人物塑造、剧情建构与主题表达等各个层面。影片以现代中国为原型建构出了一种神话公共空间，兼而揭示出自然空间的边缘化特征，突出表现的两者之间的“空间冲突”蕴含着超越“自然胜利”叙事的生态观念。影片同时也关照了宏观叙事之下的个体存在，既通过对比家园空间的造型方式探讨了边缘群体的多元身份认同，也通过对“灵质空间”这一特殊异质空间的刻画传达出对个体精神归属的深层思考。考察该影片中多元的空间呈现与空间叙事手法，能为我国动画电影提供新的创作路径参考，积极发挥空间元素在各个叙事环节中的能动作用。

关键词：《罗小黑战记》；空间叙事；空间；二维动画电影

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产品，国产动画电影凭借显著提升的作品质量与票房成绩，正受到大众市场与学术界的关注。在神话题材动画电影占据市场主流地位的当下，《罗小黑战记》和其主角“罗小黑”（外形为一只通体漆黑的小猫）是我国近年来较为少见、也较为成功的原创动画IP，其最早于2011年由寒木春华动画公司推出网络动画，发展至今已经衍生出网络动画、2部动画电影、漫画、文创产品等众多叙事媒介，从而形成了稳定的商业IP产业链。其中，第一部动画电影《罗小黑战记》（中国，2019）在上映时虽有《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国，2019）珠玉在前，仍以3.16亿的票房跻身2019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前十，也刷新了国产动画电影日本发行的票房纪录。该影片主要讲述罗小黑如何在流浪中寻找家园并建构自我，在画面呈现、人物塑造、主题阐释等方面充分运用空间的叙事性与表征性，其空间叙事手法对于研究国产动画电影的叙事问题极具参考价值。

古典文学与神话改编作品在近十年的国产动画电影中占据主流，这些作品积极探索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但也暴露出部分潜在问题，除了题材上对传统文化IP的过度依赖，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剧情建构、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叙事性问题。以往针对国产动画电影的叙事研究，多通过批判地运用电影叙事学、电影符号学等理论，对经典作品进行个案分析，或系统性讨论动画电影的叙事元素，从空间叙事视角切入的研究较少，空间问题常被笼统涵盖在叙事元素中。本文试从空间叙事视角切入，以电影空间叙事理论为参照，针对动画电影《罗小黑战记》的空间叙事问题展开研究。根据该片蕴含的“生态保护”与“寻找家园”的双重叙事主题，将影片中的叙事空间划分为公共空间、自然空间、家园空间与灵质空间四大类型，通过深度剖析具体电影文本，分别探讨这四类空间的特殊造型方式，分析其如何参与人物塑造、剧情发展并呈现价值冲突，从而挖掘该片空间叙事手法对我国动画创作的借鉴意义。

一、公共空间：“反常化”的日常空间

不同于古典文学IP动画电影对古代空间的重构，《罗小黑战记》将背景设置在现代中国，以主角的流浪之旅为线索形成串珠式的空间景观，结合多线性发展的叙事结构展现出丰富的地理图景。其中，公共空间是故事发展的主要背景，指代“供公共活动使用的城市空间”[[1]]，该影片对其真实且平实的造型刻画追求，建构出一种“反常化”又“日常化”的现代神话空间，而这种对日常空间的回归实则开辟了传递中国风意象的另一途径。

影片一开头便展现了罗小黑在乡镇边缘地区的流浪生活（山间公路、乡村田野与被污染的自然森林等），此处镜头大量采用大远景突出主角的渺小，但画面与配乐所塑造出的情感氛围又是平和的。尽管城市侵占了小黑的森林家园，但也对他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包括人类留下的美味食物、友善的孩童、漫天飞扬的风筝等，现代社会既使主角孤苦伶仃，也赋予其崭新的生活体验。这种温和的空间意境所传达出的人物情感与后续的台词相吻合[[2]]，由此奠定该影片整体上平静祥和的氛围基调：小黑对森林的消失束手无策，但仍然保有着良知的底线。在这串镜头之后，画面转入对城市边缘空间的描写：在阴暗的小巷中，小黑受到了人类的袭击，最后被妖精风息解救。影片在此多采用近景镜头与仰视视角，让观众得以从小黑的角度观察外界，烘托它被人类包围的逼仄感与紧张感。公共空间在此展现的是充满危险的形象，边缘地区的敞开性与隐蔽性为暴力行为提供了场所，实际上也为风息的阴谋埋下伏笔，此处的人类实际上是由风息的同伴所操控，小黑与风息的相遇都是他们一行人精心策划的结果。不同于边缘空间的危险性，小黑在之后到达的现代都市重点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包容与繁华。罗小黑在路上不断收到陌生人的善意，丰沛的物质资源、神奇的现代产品与便捷的生活方式不断刷新着主角的认知，加之与亲和派妖精的交流，他对人类的态度开始发生积极的转变，让其在无形之中接纳了这座人妖共存的现代城市。公共空间是罗小黑的

要活动场所,影片对其特征呈现的演变也是主角心态变化的具体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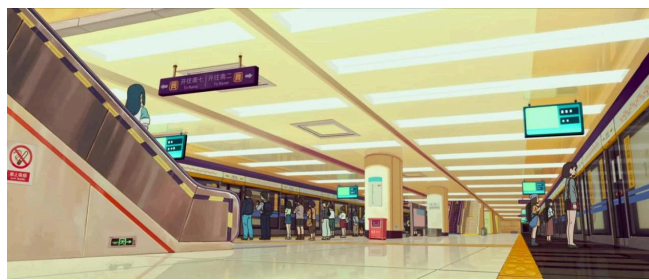
该影片在美术风格上受到日本主流商业动画影响,但其精神内核仍是中国的。观众能对其中的特定元素产生文化认同,这种体验主要来自于该影片着力刻画的日常空间。在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间理论中,每一处空间最初都是陌生的“他者”,在长期居住的过程中,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忆会不断堆积,直至上升为地域性的归属感,使空间成为“地方”[[3]]。“地方”是承载着生活气息与在地经验的日常生活空间,它为人们提供了存储感情与记忆的场所,对个体的情感归属具有重要的维系作用。因此,若想唤起观众的文化归属感,换言之便是给予观众一种“中国风”的感受,既可以选择表现中国传统符号,由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唤起直接的情感纽带,也可以选择回归空间的日常性,通过展现空间中凝聚的共通经验引起观者的共鸣。相比起堆砌传统符号,该影片选择融入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空间。在罗小黑初入人类城镇时,影片通过一镜一景交叉讲述了主角二人与妖精风息一行人的跋涉过程,为观众展现了具有代表性与识别性的中国地理景观:从山清水秀的自然景区,到白墙黑瓦的徽派古镇,到清幽宁静的江南小院,再到古朴典雅的书画小店,流动叙事与多线发展的结合极大地拓展了空间延伸感与景观丰富性。在小黑进入现代城市后,影片对空间细节的刻画同样不遗余力,包括张贴着公益标语的快餐店、广告林立的商业街区、小旅馆的标准双床房等(图1)。该片制片人丛芳冰认为,“所谓的中国风并不是标签化和符号化的,而是文化上的概念,文化是融入在生活当中的……那些很本土、很接地气的东西放到电影中,观众也会产生亲切感。”[[4]]对中国观众而言,通过识别并代入影片中的日常生活图景,更易引起认同感与归属感,而在对外传播中,这种真实的日常空间呈现不仅客观展现了广阔的中国地理图景,更传达了丰富的情感体验与在地经验,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外传播了现代中国故事。



(a) 双人间旅馆



(b) 商业街区



(c) 地铁站内

图1 亲切的日常空间元素

影片在关注空间日常性与真实性的同时,也加入了脱离日常的奇幻元素,充分发挥了动画电影的想象力消费特征。在角色设定上,《罗小黑战记》中的妖精形象类似于中国传统志怪小说中的“精怪”,“精怪化人”现象在此类小说中屡见不鲜,其中以动物成精居多,其显著特征便是能够化为人形。这种人化过程在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影响下,经历了由外部形态至内心世界的彻底人化[[5]]。影片由此出发,赋予了妖精独立的个体意识,以及可以在人形与动物之间自由转换的外貌,并加入“御灵系统”、“修仙”等奇幻元素,设定他们天生能够使用超自然力量。在叙事空间的建构上,该片突破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泾渭分明的“三界”空间设置,将天界、人界与地界融合为全新的现代神话空间,其物质环境完全参考于现代中国,其中的主体却包括了人、神、妖,三者的身份不再以所处的空间来区分,而是以个体本身的特征为判断标准。这种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现代神话空间孕育着多元的种族文化,为不同文化与价值观之间的戏剧性冲突提供了广阔舞台。在高潮部分,公共空间因为人妖双方的斗争开始崩塌,影片运用俯视视角的大远景镜头展示了被“领域”[[6]]所吞噬的城市中心,如黑洞一般的神秘空间赫然盘踞在城市星火的最中央(图2),现代都市在一夜之内成为一座“无人之城”。尽管战斗碾压后的城市变得满目疮痍,影片依然以初升的黎明作为结尾,象征着日常秩序最后终将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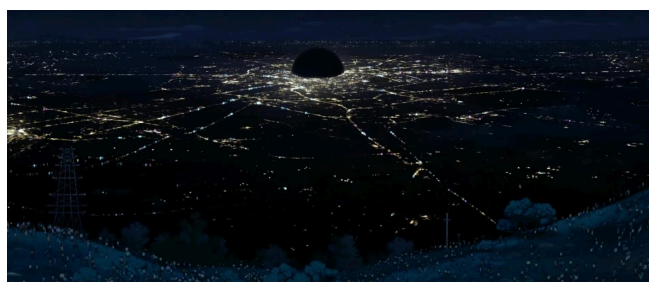


图2 被“领域”吞噬的城市中心

二、自然空间：“乌托邦”的幻想与幻灭

作为与公共空间并置的故事背景,影片中的自然空间始终以“乌托邦”的形象存在,除了开篇的世外岛屿以外,它只出现在回忆与梦境中,此处的“自然空间”指代“自然特质占据优势的空间或者其中包含自然特质占据优势的物的空间”[[7]]。本节从自然空间的造型特征切入,探讨影片如何呈现并解决它与公共空间的“空间冲突”,挖掘其中蕴含的生态观念与生态反思。

在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的“空间生产”理论中,不同于人类生产的社会化空间,自然空间是自然界创造的产物,它作为空间生产的基础正面临着被消耗殆尽的危险[[8]]. 开篇展现的森林倾倒暗示着自然在该片中的形象与地位,即被人工环境边缘化的自然空间正在无可挽回地消逝。在影片中,“离岛”是唯一实际存在的自然空间,它是一座被人类遗弃的世外孤岛,风息等妖精将它作为藏身之地。岛上草木茂盛、灵力充沛又远离人烟,熟悉的自然环境与同族的善意让罗小黑对此处产生了归属感,虽然只在这里过了一夜,但他已经将离岛认作为理想的家园(图3)。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认为,“乌托邦”是一切普遍关系得以理想化的国度,它外在于真实世界,仅仅是一种对人们追求理想世界的安慰[[9]]. 同样,作为一种“乌托邦”而存在的离岛是虚幻脆弱的,仅仅一夜之内,离岛便在人妖的斗争中被破坏殆尽,妖精伙伴们全部逃离,小黑也被强制带走。实际而言,影片中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空间,人类的力量从始至终都可以轻易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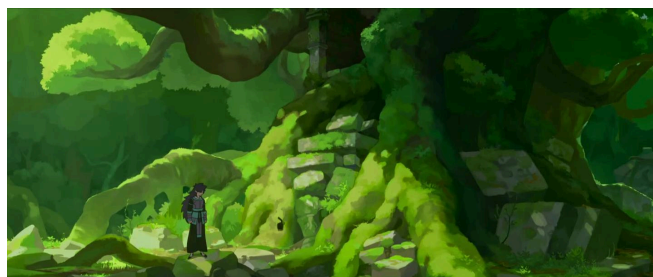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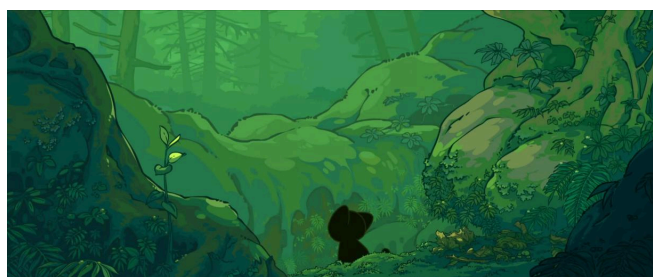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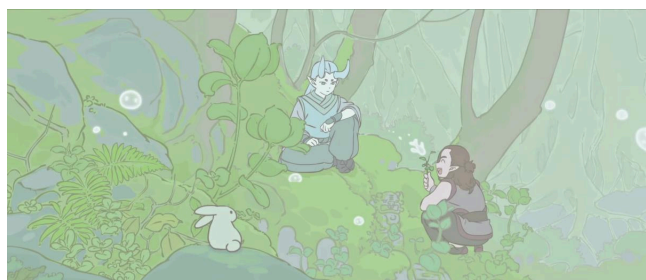


图3 离岛的环境

在主角的流浪过程中,自然空间以梦境与回忆的形式反复出现。影片开篇的繁茂森林是罗小黑的故乡,但从非写实的地表坍塌与大跨度的时空转场中可以看出,这只是小黑的黄粱一梦,他始终在寻找如梦中一般不受人侵扰的自然森林。妖精风息与小黑遭受了相同的命运打击,在风息的回忆中,他的故乡最初也是一处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妖精与自然和谐共生,直至工业时代以后,自然空间便彻底沦为人工环境扩张的牺牲品。影片对梦境与回忆这两种非现实空间中的自然森林刻画(图4),在美术风格上与公共空间截然不同[[10]],时刻强调着自然空间在现代社会中的异质性。需要注意的是,梦境与回忆同个体的潜意识相联系,以此形式反复出现的自然空间实际上承载着妖精对森林的集体记忆与共通情感。自然空间在物质意义上的消失并不必然导致其精神象征意义的终结,妖精们反而会在心理的反向作用下产生以想象为特征的精神性空间,并将其作为目标与心理支持,不停地在现代社会中寻找着不存在的“乌托邦”,影片也由此发展出妖精们不同选择下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a) 罗小黑梦境中的森林



(b) 风息回忆中的森林

图4 以特殊风格表现的回忆与梦境

影片中的自然空间不仅是静止的符号性存在,它与公共空间之间也发生着动态的“空间冲突”[[11]]. “空间冲突”的研究视角多出现于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等人文科学领域,而在叙事学领域,针对空间的研究一般集中于叙事空间本身的特征、作用与内涵,较少关注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强调了这一点,指出“空间冲突”不仅代表着人物性格的冲突,也潜藏着价值观、制度与文化的冲突,是社会关系冲突的空间化象征[[12]]. 《罗小黑战记》展现了公共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对立状态,尽管两者在表面上处于微妙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建立在自然空间不断消亡的基础之上,两者的“空间冲突”一直在和平的表象下蠢蠢欲动。

影片中发生过三次自然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空间冲突”,双方冲突主要围绕空间资源竞争展开,均以公共空间一方的包围与压制而结束。其中,前两次冲突是对现实生态状况的真实揭露,而第三次冲突的爆发与化解实际上传达了影片深层的生态价值理念。在第三次冲突中,风息因为坚定地认为人类的贪欲永无止境,不惜伤害罗小黑并夺取了他的特殊能力,企图以此控制整座城市,从而实现驱赶人类、恢复自然的愿望。风息作为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希望构建一种排除人类的生态社会系统,但他的行为建立在牺牲同族的基础之上,这种具有强权性的手段存在着潜在的伦理风险。相反,以无限为代表的妖灵会馆倡导的是一种共存的社会理想,他们建立妖精管理机构与人类进行共同治理,帮助妖精融入现代社会。在影片的最后,风息被小黑与无限打败,他选择将自己的生命化为参天巨树,而小黑则将城市从“领域”中释放出来,继续与无限流浪。主角全片都在寻找梦中的自然家园,最后却选择了继续流浪,说明他最终并没有与现代社会完全融合,也没有完全忘却自然森林,而是以“流浪”这一冷静而疏离的方式守望着二者。影片以此结尾,从根本上否定了排除人类、创造纯粹自然世界的想法,传达出一种超越激进生态主义的生态观:不应以绝对的对立性来设想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而是需要关注二者在世界中的同等重量,在接受现状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共赢的生态治理模式,在影片中便是建构“妖灵会馆”这一中立管理机构,以跨物种共治的方式维护这个人妖共生共享的现代社会[[13]].

《罗小黑战记》的导演曾承认受到日本动画的影响,尤其是以宫崎骏为代表的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电影[[14]]. 不可否认,宫崎骏导演的诸多作品在叙事主题与叙事手法上更

为成熟，他深受日本的“森林信仰”与“万物有灵”论思想的影响，其导演的《风之谷》（日本，1984）《天空之城》（日本，1986）《幽灵公主》（日本，1997）等作品都着重表现了自然的超然力量，警示人类的破坏行为必然会受到反噬，充满着对两者关系难以调和的困惑与哀婉，从内核上秉持着一种悲观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相比之下，《罗小黑战记》对自然空间的“乌托邦”式塑造也并不是全然消极的，公共空间对自然空间的侵蚀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对生态状况的真实揭露同样能引起观众的警醒。该片既没有夸大自然的力量，悲观地预设人类受到反噬的未来，也没有消极地顺应非生态化的人工环境扩张，而是选择真实地展现自然空间的边缘化状态，一定程度上映射出被完全客体化的现实自然环境，突破了充满悲观主义的“自然胜利”叙事。

三、家园空间：流浪者的精神归属

家园空间作为人物自我认知的空间化象征，与个体的身份认同感紧密相连。该片深度挖掘了家园空间与个体身份之间的关联性，展现妖精这一边缘群体如何重建家园并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关于个体如何理解自身的问题，也是个体在群体中对自我归属的认知，社会形态的改变、原初家园的变迁都会对其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家园作为个体“最早的世界”[[15]]，它从造型特征上反映个体的生活方式，成为确认自我、区分他人的私人空间，同时给予个体以庇护感、包容感与幸福感，个体只有通过家园这一锚点的存在才能确认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影片中展现了多位角色对家园空间的差异性建构方式，由此呈现出身份认同的多元性与流动性，反映出该片对现代变迁中个体精神归属的深层反思。

加速的城市化、工业化与商业化毁灭并改造了自然森林，正如一位妖精在影片中所说，他的故居曾是一处漂亮的洞穴，如今却被建造为供人参观的自然景区。家园空间作为存储记忆与情感的特殊场所，它的消失意味着个体失去物质意义上的庇护所，进而导致精神根基与身份归属的“流浪”。妖精作为日益扩张的现代社会的边缘群体，能否构建出对立统一的“人类—妖精”二元身份，决定了他们能否在人类社会找到自我归属。在影片中，管理组织妖灵会馆考虑到妖精的数量与特殊能力，规定妖精必须隐藏身份、化为人形才能进入人类社会，接受了这一规则的妖精实际便是接受了公共空间与自然空间不对等的现实，选择积极融入现代社会，他们会变为人类中的一员，包括上班族、退休老人、乞丐等等。此类妖精根据不同的生活环境建构出了相对应的崭新身份，表面的人类形貌与实质的妖精本体和谐共存，由此在现代社会中确立了自我归属。

现代社会的变迁既可能带来多元身份的融合，也可能使其走向分裂，让个体身份永远处于“流浪”之中。兴建的现代城市摧毁了风息等妖精的生存空间，剥夺了其中凝聚的身份归属，他们从森林流落到城市边缘的荒地，所形成的心理落差不可避免地带来对自我身份的困惑。风息一派的妖精无法破除这份迷茫，仍然将消失的森林作为精神家园，选择居住于远离人烟的世外孤岛，而孤岛作为影片最先展现的家园空间，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中居住者的命运走向。家园空间的

长久缺席让风息的内心无法安宁，他寄希望于小黑的特殊能力，企图将回忆中的自然森林再现于旧日故土之上。然而，纯粹的自然空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将身份归属寄托在这种虚幻的空间中，不仅为他的行动埋下了失败的因果，也动摇着他的自我认知。在影片的最后，“领域”的消失断绝了纯粹自然空间的可能性，身份锚点的彻底消失使得风息选择自我了结，将生命化为参天巨树（图5）。在影片开篇，小黑被迫看着离岛远去，而在影片末尾，他同样看着风息埋葬在巨树之中，两者的消失情节与画面呈现遥相呼应，风息这一人物的性格、动机与命运在一开始就被其栖居的家园空间决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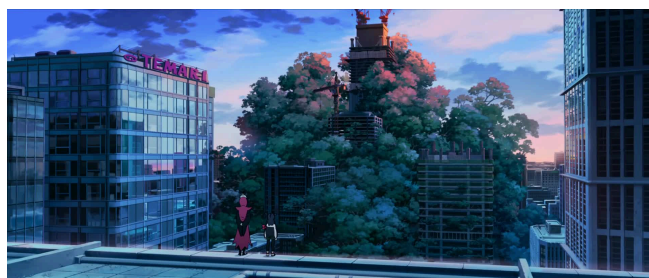


图5 风息化成的巨树

小黑的经历与风息类似，两者都被剥夺了原初的家园，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流浪者。但不同的是，风息因不接纳现代社会而无法找到身份归属，最终在无根的痛苦中死去，而小黑却从被动的“流浪”转向主动的“流浪”，由无奈的漂泊转变为自觉的探索。影片所强调的家园空间并非物质性的生存空间，而是现代文明挤压之下流浪者追寻的精神归属，在巴什拉看来便是发展出“内心空间”的广阔性。巴什拉认为：广阔性是内心空间的原初价值，它整合着所有尖锐的对抗性[[16]]，在不断延展的广阔性中，个体得以深刻地感受自我存在，并在其中获得心灵的栖居。在影片的结局部分，所有的斗争与矛盾全部消失，只留下一片广阔的云上天池，而在蓬莱仙境一般的妖灵会馆前，罗小黑放弃了追求的安定生活，选择与无限继续流浪。主角的最终选择传达出影片对流浪者身份与精神的肯定，身体的漂泊并不等于心灵的流浪，主动的跨界可以使人拥有流动的视野，以此打破思想的壁垒与界限。该影片展现了罗小黑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意义上对家园空间的重构，体现出对边缘群体生活状态的思考，小黑在“流浪”中锻炼出的广阔内心治愈了受伤的过往，他既没有与城市彻底融合，也没有与其完全决裂，而是以一种相对冷静的态度接纳了它，在主动的“流浪”中获得心灵的安居。

灵质空间：外置的心灵世界

“灵质空间”是该影片创造的特殊概念之一，它作为影片世界观中的重要一环，在功能属性与造型特征等方面都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与私人性。影片将灵质空间的物象表征与角色主体性的成长相联系，通过刻画动态的空间演变来反映主角的成长弧线。此外，灵质空间作为一种“异质空间”呈现出多元性、异质性的特殊表征，其中蕴含着影片对角色动机与生态观念的价值判断。

《罗小黑战记》的世界中存在着常人无法看见的“灵”，这种物质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气”一脉相通。“气”一般指维持

人体自然生命力的能量，即所谓的“精气”“血气”，影片将其转化为“灵”的概念融入世界观中，人妖进行修炼便是提升对“灵”的控制水平。与“气”“灵”的概念相对应，储存“灵”的灵质空间则从“丹田”的概念转化而来，丹田是人体储藏精气神的重要部位，也是纳气蓄气的主要场所，被视为生命的根本所在，因此灵质空间同样被设定为生命的重要支撑，同生命运转与修行水平紧密关联。另外，灵质空间还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与排他性，空间的主人可以制定空间规则，包括改变重力、控制外来者等等，它的造型特征与内部结构也会因主人的心理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影片中的灵质空间也被转化为各个角色心理世界的具象呈现。

罗小黑的灵质空间经历了萌发、修炼、争夺、毁灭到重生的演变过程，作为其心理的空间化呈现，它的变化反映着个体主体性的发展弧线。小黑的“领域”能力是将自己的灵质空间外放于现实世界，即可以自由控制现实世界中的一部分，因此风息一直觊觎着小黑的能力。灵质空间的第一次出现是小黑在海上风暴中无意间使用了“领域”的能力，它的出现使小黑意识到自己的无限潜能，成为认知自我的第一步。第二次出现则主要用于讲解世界观，无限让小黑进入了自己的灵质空间，向小黑与观众初次展现了这片空间的形态与性质，二人在此初步建立了师徒关系，也代表着小黑跟随无限正式踏上了寻找家园、建构自我的旅途。灵质空间最后一次出现在影片的高潮部分，风息夺走了小黑的“领域”并在城市中心释放，而小黑被夺走能力后，无意间进入了自己的第二个灵质空间。主角在经历背叛的阵痛后激发出全新的潜能，将死的他在纯白的灵质空间内苏醒，以彻底放弃对“乌托邦”的幻想为代价获得了新生。最终，小黑与无限联手打败了风息并夺回了自己的灵质空间，他对灵质空间的完全控制代表着自我主体性的完全成熟。在影片的最后，小黑选择放弃外放的灵质空间，此举不仅仅是放弃了独一无二的能力，也相当于放弃自我生命中的兽性部分，即对外界资源的侵占欲望，小黑至此彻底摆脱了“领域”这一空间的束缚，以主动“流浪”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作为高潮的主要场所，吞噬城市中心的灵质空间实际上是风息这一人物的空间化表征，也是影片生态观念的隐喻性表达。风息夺取并释放了小黑的“领域”，外放的灵质空间从地下停车场逐步扩张，如黑洞一般吞噬了大片的城市，此时的灵质空间内部成为福柯笔下的“异质空间”。福柯认为“乌托邦”是不存在于真实世界的，它是完美的社会本身或是社会的反面，“异质空间”则是在真实场所中被有效实现的“乌托邦”[[17]]。“异质”指代功能或意义上的偏离常态，“异质空间”虽然存在于某个真实空间内，但又超越了真实空间本身，换言之，它能够使多元的、异质的因素并置，是现实中存在的一种既在“此处”又在“他处”的特殊空间形式[[18]]。在这个灵质空间内，被吞噬的一切都异常化，呈现出脱离现实的诡异特征：一方面，传递时间感的天空被阻隔在外，空间内只留下纯白的天幕，外部喧闹的声音被抽空，固定空间感的重力也可以被随意改变，一般性的常识在此处被完全解构，让观众仿佛来到了停滞的外太空；另一方面，城市建筑扁平化为无生气的模型，在纯白背景的映衬下显得缺少环境色的渲

染，并在人妖斗争中进一步崩塌为满天的土块碎石，空间内由此呈现出的是一个被工业废料所占据的废弃城市景观（图6）。



图6 被“领域”吞噬的城市废墟

巨大的“黑洞”赫然盘踞在现代城市中央，虽然紧紧依靠着城市星火，却又与其迥然不同，看似近在咫尺，实际上却无法进入，成为一处既在“此处”又在“他处”的“异质空间”。这是私人空间对公共空间的公然侵占，是个人理想对残酷现实的顽强挣扎，更是风息作为自然化身的妖精对现代社会的舍命反抗。影片多次运用大远景镜头展现这个巨大的“黑洞”（图7），在内部异化的废土景观与外部无边的城市灯火的对比之下，更凸显出这一空间的虚幻性，但风息却希望在这个被城市包围的废墟之上重建森林，暗示着他的理想家园实际上只是一处不切实际的“孤岛”，从根本上否定着风息激进的生态理想与实践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该片并没有否定风息这一角色本身，影片对风息的心理描写与行为刻画为他提供了合理的动机解释，突破了简单的二元人物形象。在结局部分，被捆绑于钢筋水泥上的风息如迷失在钢铁丛林中的困兽，他用生命化成的巨树破开高楼大厦顽强地向上生长，短暂颠覆了自然空间的被动状态，由此传达出对这一角色的理解与怜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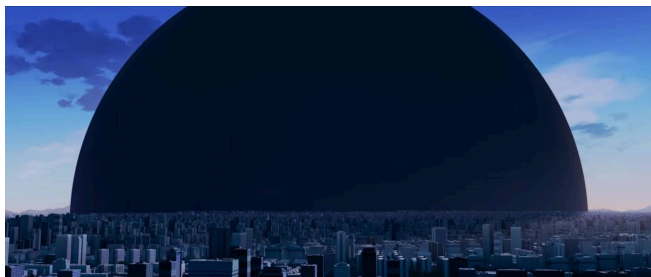


图7 盘踞在城市中心的灵质空间

结语

动画电影《罗小黑战记》凭借巧妙的空间叙事手法，赋予空间以能动性，使其成为推动叙事、塑造人物、深化主题的关键要素。影片中的公共空间与自然空间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前者成为一种基于日常、超越日常又回归日常的现代神话空间，为传播“中国风”开辟新径；后者的“乌托邦”式塑造则真实揭示了自然的边缘化状态。两者之间的“空间冲突”展现出影片对生态保护母题的思考，该片没有一味批判现代化的消极性，而是从中发现了重建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的可能性。家园空间、灵质空间与影片的内在主题——“寻找家园”“认识自我”紧密联系，引导宏大的生态叙事向个体成长叙事转变，反思现代生活中渺小个体的精神归属。影

片刻画了边缘群体对家园空间的追寻与多元身份的建构,主角的主动“流浪”最终传达出一种与现代社会既交互又疏离的冷静态度;灵质空间则以“异质空间”的特殊形式呈现,其时空与景观的异化蕴含着影片潜在的价值判断,引导观众进一步反思自然与工业的复杂关系。当下,中国国产动画电影正在飞速发展,若想进一步在海外市场上站稳脚跟,必须继续深挖原创叙事潜力,积极发挥空间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中的叙事性与隐喻性,于能动性的空间之中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 陈竹,叶珉《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空间公共性的判定》,《国际城市规划》2009年第3期。
2. 无限询问小黑他如何向人类复仇,小黑回答道:“我只是想要回到森林。”
3.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4. 陈晨,李丹《49亿<哪吒>与3亿<罗小黑战记>,国产动画电影“破圈”进行时》,《影视制作》2019年第10期。
5. 朱迪光《中国古代精怪故事中的精怪人化》,《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6. “领域”是主角罗小黑拥有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在现实空间中划分出一块特殊场域,这片空间中的一切都由其主人所控制。
7.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24页。
8. 同[7],第126页。
9. (法)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10. 寒木春华《<罗小黑战记>大电影官方设定集》,浙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4版,第56-58页。
11. 同[7],第129页。
12.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81-282页。
13. Li Guo, Animating Eco-aesthetics: Multiplanar Images, Interspecies Government, and Eco-conscious Gaming in The Legend of Hei (2019) and Its TV Series (2011–Present), Journal of Chinese Film Studies, 2023, pp. 159-184.
14. 杨晓林《比较电影学视域下中日生态动画观及叙事美学探赜——以<罗小黑战记>与“吉卜力”动画为例》,《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15. 同[3],第5页。
16. 同[3],第210页。
17. 同[9],第54页。
18. 同[12],第287-288页。

引用本文：旻凯 李. 人工智能辅助下的喜剧角色塑造：技术与创意的融合[J]. 现代艺术与传播, 2026, 1(1): 7-10.

收稿日期：2026-06-29

人工智能辅助下的喜剧角色塑造：技术与创意的融合

旻凯 李

摘要：在喜剧表演艺术中，角色塑造是核心环节，它不仅决定了作品的幽默效果，也是与观众情感共鸣的桥梁。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在戏剧领域的应用为喜剧角色塑造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本文深入探讨了AI技术如何辅助喜剧角色的创作，并分析了技术与创意结合对喜剧表演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人工智能；喜剧角色塑造；技术与创意融合；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

一、引言

1.1 角色塑造的重要性

角色塑造在喜剧创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接决定了作品的成败。一个生动、立体的角色能够引发观众强烈的共鸣和情感共振，进而推动情节的发展。而如果角色缺乏深度或个性，喜剧的幽默效果往往难以实现，观众在面对单薄的角色时，难以产生真正的情感投入。历史上诸多经典喜剧作品的成功，恰恰源于那些具有鲜明个性的角色，如查理·卓别林的“流浪汉”形象，既富有同情心又充满幽默感，使得观众在欢笑的同时也体验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能够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角色，不仅有助于强化作品的主题，更为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角色的多维度塑造，既包括其背景故事、行为动机和情感变化，还涉及到其与其他角色的关系，这种复合的角色关系网使得喜剧作品更具层次感和深度。此外，角色的设计与观众文化背景的契合也不可忽视。喜剧往往以其独特的方式反映社会现实，角色的塑造不仅要贴近生活的真实，还需注入一定的夸张与幽默，以此来揭示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荒诞。因此，角色塑造过程中的技术与创意的结合尤为重要，这既是挖掘角色潜力的过程，也是提升作品整体艺术价值的关键所在。通过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创作者们可以更高效地探索角色的多维可能性，为喜剧角色的塑造带来新的灵感与可能。借助数据分析和情感识别等技术，创作者能够精准捕捉观众偏好，进而设计出更具吸引力的角色，从而实现技术与创造力的完美融合。通过这种方式，喜剧角色的塑造不仅是艺术创作的体现，更是文化传递的重要载体。

1.2 人工智能在戏剧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戏剧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得剧作家和导演能够在创作过程中融入更为丰富的思维方式和创新的技术手段。通过智能算法的运用，戏剧创作的流程被重新定义，创作者不仅能够体验到数据分析所带来的精准洞察，还能借助机器学习技术实现角色塑造的深度挖掘。人工智能能够分析大量的剧本、角色行为和观众反馈，从而识别出潜在的情感走向和叙事结构，使得创作者在构建剧情

时得以超越传统的思维桎梏，探索更为复杂而富有层次的角色关系。

此外，人工智能在生成文本和创意构思方面的能力，使得剧作家可以从中获得灵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形成初步的剧本草稿。这一技术的引入，不仅加速了创作过程，更重要的是为创作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角色的动机、背景和情感。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不仅是创作工具，更是激发创意和推动创新的助力。它促使人类艺术家与机器之间建立起一种协作关系，二者共同参与到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使得戏剧作品在思想和形式上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工智能在戏剧创作中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价值，但其在角色塑造和剧本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得到审慎的评估。创作者需要在技术与艺术之间寻找平衡，确保人类情感与智能化思维能够和谐共存。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人工智能如何赋予戏剧创作新的可能性与创新思路，最终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和深刻的艺术体验。

二、喜剧表演中的人工智能辅助技术应用

2.1 自然语言生成

在当代喜剧表演的舞台上，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地推动着创意与表现形式的边界，特别是自然语言生成技术的应用，赋予角色更为丰富而多维的表现空间。通过对大量幽默文本的学习与分析，AI能够生成符合特定语境与角色特征的台词，从而使得喜剧表演不仅在内容上更加多样化，也在形式上展现出新的活力。AI生成的语言具备灵活性与创新性，它能够实时捕捉观众的反应，依照情境的变化进行调整，提供即时的幽默反馈。这种能力不仅为演员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可能性，同时也使得角色之间的互动更为自然与生动。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剧本创作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通过自然语言生成，角色所具备的幽默感不仅限于先前设定的台词，而是可以实时生成，拓展了角色的表现深度，使其具有了更强的适应性与个性化特征。这种技术的融入使得创作者能够突破以往的创作框架，通过智能算法的辅助，探索更为大胆的叙事路径与幽默手法，进而实现更具感染力的表演表现。与此同时，AI所生成的语言也能够语音、语调和节

奏上与角色的特定属性相结合,强化角色的个性展示。在这样的技术支持下,喜剧不仅是简单的台词与表演的结合,而是一种综合多重因素的艺术表现,体现了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因此,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生成技术为喜剧表演的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助推,也为角色的生动塑造与情感传递开辟了崭新的艺术空间。

2.2 情感识别技术

在当代喜剧表演中,情感识别技术的应用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全新的创作视角。这项技术基于深度学习和模式识别算法,能够通过分析观众的面部表情、语音语调乃至生理反应,精准捕捉其情感状态。这样的技术不仅仅是对观众反应的冷冰冰的量化,更是对喜剧创作过程的深度介入。通过对观众情绪的实时监测,表演者可以迅速调整表演的内容和风格,以此达到最佳的喜剧效果。这一创新方式打破了传统表演中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单向互动,使得创作与反馈成为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极大地丰富了喜剧表演的表现手法。

情感识别技术的引入,促使表演者在创作过程中更为深入地理解观众的心理。传统喜剧表演往往依赖于演员自身的感知与经验,而情感识别技术则将这种主观判断转化为客观数据,从而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分析工具。借助技术的力量,演员可以更清晰地识别出哪些情感元素最能引发观众的笑声与共鸣。这种基于数据驱动的创作方式,使得演员在构建角色时不仅考虑个人的艺术表达,更能针对观众的即时反应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形成一种更为丰富的表演语言。

在未来的喜剧表演中,情感识别技术无疑将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不仅激发了演员的创造力,也使得观众的参与感和沉浸感得到极大增强。这种双向的互动形式使得喜剧表演不再是一种单一的展示,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生态。借助人工智能的情感识别技术,喜剧表演的创作与演绎将跨越以往的界限,推动这一艺术形式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情感识别的应用,正为喜剧表演开辟出一条全新的探索之路。

三、塑造角色的创新方法与影响

3.1 喜剧角色的数字化塑造技术

数字化技术赋予喜剧角色新的生命和表现方式,成为当代喜剧创作的重要推动力。随着计算机图形学、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创作者们得以在数字空间中重塑角色,使其不仅限于传统的舞台表现。通过高精度的数字建模与动画技术,喜剧角色不再受制于物理现实的界限,能够展现出更加夸张和富有表现力的形象。这种转变使得角色的情感表达和肢体语言得以在全新的维度中展开。数字角色的设计过程不仅是技术的体现,更是创意的延伸,设计师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尝试多种风格与形式,迅速迭代与优化,从而诞生出更具个性化的喜剧角色。

数字化技术不仅仅在角色外观上发挥影响力,还赋予角色更多的动态特征与交互性。通过实时捕捉演员的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数字角色能够在表演中实时响应,创造出更加生动和真实的喜剧效果。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增强了角色的表现力,也使得观众与角色之间的互动体验更加紧密。观众

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可以在数字媒体的环境下与角色进行互动,甚至影响角色的表现。这种双向的交流进一步丰富了喜剧的叙事层次,打破了传统表演艺术的界限,使得喜剧作品能够在更广泛的语境中产生共鸣。

同时,数字化技术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创作门槛,使得更多的创作者得以参与到喜剧角色的塑造当中。无论是独立制片人还是小型团队,都可以利用数字工具进行角色设计与制作。这种去中心化的创作模式促进了多样性的出现,各种风格和文化背景的角色应运而生,进一步丰富了喜剧的生态系统。因此,数字化赋予喜剧角色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艺术表达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为喜剧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可能性。

3.2 虚拟现实在角色创作中的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角色的创作与塑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极大地丰富了创作者的表现手法与想象空间。在这一背景下,角色不仅仅是剧本中的文字符号,更是通过虚拟现实设备与用户之间的互动,转化为富有生动性的存在。通过沉浸式的体验,创作者能够在一个三维的虚拟环境中,直观地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变化和行为反应。这种体验不仅使角色的性格特征得以深入挖掘,还促使创作者在角色发展过程中,依据实时反馈调整其设计。例如,角色在虚拟环境中的饱满表现可以直接影响观众的情感共鸣,而这种共鸣又为角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虚拟现实技术赋予了角色多维度的交互性,创作者不仅能够塑造角色的外在形象,更能通过环境与角色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其内心世界与社会背景。这种交互式的创作方式,不再是单向的内容传递,而是形成了多元化的叙事结构,使角色在叙事中获得更深层的意义。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虚拟现实如何改变角色创造的传统模式,尤其是在喜剧创作领域中,虚拟现实的应用为角色塑造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方法。这种技术与创意的融合,不仅增强了角色的真实性与吸引力,更为喜剧的表现形式赋予了更多的创新可能性。通过对角色的虚拟构建,创作者得以打破原有的创作限制,开拓出一种全新的艺术表达方式,最终促成了角色塑造的革命性变革。

四、技术与创意的融合对喜剧表演的影响

4.1 数字化表演工具的创新运用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数字化表演工具的创新运用为喜剧表演的创意赋予了新的维度。这些工具不仅为表演者提供了广泛的创作可能性,更通过技术的力量深化了观众的体验。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喜剧表演可以打破传统舞台的限制,使演员与观众之间形成更加直接和互动的联系。这样的交互体验极大丰富了喜剧的表现形式,演员能够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即兴演出,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幽默效果,这种新颖的手法有助于激发观众的想象力,增强了表演的趣味性。

与此同时,数字化工具的运用使创作者能够通过数据分析更精确地理解观众的喜好和反应。这种实时反馈机制促使演员在演出中不断调整表现,确保幽默效果的最大化。表演者也能够通过视频编辑和特效处理,重新构建他们的作品,探索不同的叙事角度和风格,这样的过程不仅是技术的运用,更是创意的重塑。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喜剧元素与

现代科技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语言,丰富了表演的层次与深度。

数字化工具的创新运用有效地拓展了喜剧表演的边界,让创作者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自由探索。通过将视觉效果与幽默语言结合,喜剧表演得以呈现出更为多元的艺术风貌。正因如此,数字化工具不仅是表演的辅助工具,更是推动喜剧创作和表现的核心动力。引入这些创新元素,喜剧表演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最终,数字化与创意的深度融合不仅提升了喜剧表演的表现力,也为这一艺术形式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4.2 虚拟现实技术对喜剧表演的改变

虚拟现实技术的引入为喜剧表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展现出人与技术交融的独特魅力。通过沉浸式体验,观众不仅能够视觉和听觉上感受到表演者的幽默魅力,更能在心理层面上与演出产生深刻的共鸣。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使得喜剧表演超越了传统舞台的限制,将观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提升至全新高度。在虚拟空间中,演员能够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角色与情境,打破时空的束缚,进而拓展了创作的边界。此时,表演者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表演者,更是虚拟环境的构建者,他们通过对技术的灵活运用,实现了情境的实时变化与角色的即时转换。这样的互动不仅丰富了喜剧的叙事手法,也使得观众在参与过程中能主动影响剧情的发展,形成一种集体幽默的共创氛围。值得注意的是,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还促使喜剧表演的风格与形式不断演变。喜剧不再仅仅依赖于语言的机智与情节的设置,而是通过对虚拟空间的精妙运用,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多维幽默感。这种跨界的结合使得创作者能够在构建角色和剧情时,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意,进而创造出更加多元化的幽默表达方式。在这种背景下,虚拟现实不仅是技术的呈现,更是艺术创作的延伸。通过这种新兴媒介,喜剧表演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成为人类文化与科技交融的生动范例,推动了喜剧艺术在新时代的再创造与再定义。因此,虚拟现实技术无疑在引领喜剧表演的未来,激发出无限可能与创新潜力,深刻影响着整个艺术生态的演进。

五、结论与展望

5.1 总结与展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喜剧角色塑造的前景愈发广阔。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如何在这一领域中融合技术与创意。人工智能不仅在数据分析和角色建模方面展现出卓越的能力,其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功能更为喜剧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通过对大量喜剧文本的学习,人工智能能够识别出幽默的本质与形式,实现对角色个性化特征的精准刻画。这样的技术赋能为创作者带来了新的灵感源泉,使他们能够突破传统的创作局限,探索更为丰富的角色层次与情感深度。

未来,喜剧角色的塑造不仅将依赖于单一的技术手段,而是将呈现出多元化的交融趋势。创作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草稿作为启发,进一步融入自身的创意与情感,共同构建出更具魅力与辨识度的角色形象。这种人机协作的模式,既提升了创作效率,也为喜剧艺术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此外,社交媒体与观众反馈机制的结合,亦使得角色塑造过程更加动态与互动,创作者能够实时调整角色发展以适应观众的需求与偏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喜剧角色的塑造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从传统的表演艺术到现代的数字媒介,科技不断推动喜剧创作的演变。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与人类想象力的无穷延展,喜剧角色的塑造将不仅仅是个性与幽默的结合,更将成为人类情感与智能交织的生动体现。这一领域将迎来更加丰富的探索与创新,激励着新一代创作者在这一充满可能性的舞台上书写属于他们的喜剧传奇。

5.2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当聚焦于拓展人工智能在角色创作中的应用与影响,这不仅关乎技术的进步,更涉及艺术表现形式的变革。随着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以及情感识别等领域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不仅能够辅助创作者生成角色的外观和性格特征,更有潜力深度参与到角色的情感轨迹与互动关系中。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如何将AI技术与多元文化的元素融合,以创造出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角色形象,反映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此外,研究者应关注AI对于创作过程中的伦理与道德影响,探讨在角色塑造中如何确保人性化与真实性的平衡。通过对AI生成的角色进行系统评估,分析其对受众情感反应的影响,亦是未来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的快速发展,结合AI的角色创作将为观众提供更加沉浸式的体验,研究如何优化这种体验将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不仅涉及到技术实现的问题,更需要深入探讨角色设计与叙事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AI增强故事的连贯性与吸引力,从而提升整体的艺术价值。同时,跨学科的合作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艺术家、程序员、心理学家及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将推动角色创作的创新与进步。未来的研究应当深入挖掘AI在角色创作中的潜力,探索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及心理学层面的意义,推动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从而开辟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和更加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付茜茜.影视符号编码：人工智能角色“失控”叙事的审美探究[J].电影文学,2023,(14):12-17.

[2]孙蕾蕾.“虚拟”与“现实”的技术重构与再造——数智技术驱动下的视听内容生产变革[J].当代电视,2024,(06):16-21.

[3]陈香敏,魏伟,吴莹.“文化+人工智能”视阈下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实践及路径研究[C]//中共沈阳市委,沈阳市人民政府.第十七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沈阳科技学院:,2020:4.

[4]谢清青.角色设计在人工智能实时动态下的创作研究[D].武汉纺织大学,2023.

引用本文：继豪 国, 超 张. 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冲绳导演高岭刚影像中的空间记忆与抵抗诗学[J]. 现代艺术与传播, 2026, 1(1): 11-15.

收稿日期：2026-06-29

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冲绳导演高岭刚影像中的空间记忆与抵抗诗学

继豪 国, 超 张

摘要：冲绳导演高岭刚以《天堂秀色》(1985)、《冲绳草莽英雄》(1989) 及《梦幻琉球·鹤与亨利》(1998) 三部核心作品，成功突破了日本主流影像将冲绳“异域奇观化”与“内部他者化”的叙事霸权。他创造性地将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干预历史的方法，与冲绳的战后创伤及本土泛灵信仰深度互文，建构出一种去殖民化的在地视听表达。本文认为，高岭刚影像中的“魔幻”并非单纯的美学技巧移植，而是回应冲绳在美日双重殖民夹缝中现实断裂性与历史荒诞性的必然认识论路径。文章立足文本细读，从空间化的记忆重构、抵抗诗学的寓言化书写，以及文化主体性的影像建构三个维度，深度剖析高岭刚如何运用本土魔幻意象、非线性时空与语言政治，解构主流现代性的单边叙事，并在影像场域中重塑冲绳被长期遮蔽的复杂主体性。

关键词：魔幻现实主义；冲绳电影；空间记忆；抵抗诗学；后殖民影像

国继豪 1 张超 1

1.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冲绳导演高岭刚以《天堂秀色》(1985)、《冲绳草莽英雄》(1989) 及《梦幻琉球·鹤与亨利》(1998) 三部核心作品，成功突破了日本主流影像将冲绳“异域奇观化”与“内部他者化”的叙事霸权。他创造性地将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干预历史的方法，与冲绳的战后创伤及本土泛灵信仰深度互文，建构出一种去殖民化的在地视听表达。本文认为，高岭刚影像中的“魔幻”并非单纯的美学技巧移植，而是回应冲绳在美日双重殖民夹缝中现实断裂性与历史荒诞性的必然认识论路径。文章立足文本细读，从空间化的记忆重构、抵抗诗学的寓言化书写，以及文化主体性的影像建构三个维度，深度剖析高岭刚如何运用本土魔幻意象、非线性时空与语言政治，解构主流现代性的单边叙事，并在影像场域中重塑冲绳被长期遮蔽的复杂主体性。

关键词：魔幻现实主义；冲绳电影；空间记忆；抵抗诗学；后殖民影像

1 引言

20 世纪中后期，日本本土兴起的“冲绳热”，本质上是服务于日本民族国家叙事的文化消费现象。主流影像将冲绳呈现为宁静、原始的南国“乌托邦”景观，却遮蔽了其背后的殖民创伤：1879 年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的“琉球处分”、二战后美国长达 27 年的军政统治、1972 年“回归”日本后仍承载超 70% 驻日美军基地的现实困境。正如 Tessa Morris-Suzuki 所言，这种呈现方式是典型的“表面多元主义” (cosmetic multiculturalism) ——将冲绳的文化差异性装饰化，以掩盖日本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与结构性压迫[1]。在此背景下，冲绳本土导演高岭刚的创作 构成了对日本主流叙事的有力反拨。

本文的核心概念“作为方法的魔幻现实主义”，指涉一套根植于本土文化、回应殖民语境下现实断裂性的影像方法论。其原型来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核心在于“将超自然、魔幻元素日常化，以此捕捉被主流话语遮蔽的‘神奇现实’”。高岭刚的本土化改造，使其与冲绳“万物有灵”的本土信仰、多重殖民的历史经验相融合，形成了以空间重构为场域、以身体叙事为载体、以主体性建构为目标的影像体系。正如 Mika Ko 所指出的，高岭刚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对冲绳历史创伤、文化认同与政治困境的诗意回应”，“既与日本民族电影形成对话，又始终坚守冲绳主体性”[2]。本文旨在通过对高岭刚三部代表作的分析，探讨其如何将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使之成为揭示被遮蔽的真实、重构文化记忆并进行政治抵抗的有效方法。

2. 空间化的记忆：魔幻现实主义视域下的视觉重构
高岭刚的影像世界首先呈现为一个被高度“空间化”的记忆场域。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从来不是中立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权力运作与意识形态争夺的场域[3]。日本主流影像正是通过对冲绳空间的均质化、景观化处理，完成了对其殖民历史的抹除。而高岭刚则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对冲绳空间进行开拓、拼贴与重构，将线性的、被官方话语遮蔽的历史创伤，转化为可感知的立体影像空间。

2.1 灵媒视角与垂直空间：生死边界的消解
在高岭刚的电影中，生与死、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这既是冲绳传统灵媒信仰的影像化表达，也是导演对抗线性史观的核心视觉策略。冲绳本土的琉球神道信仰中，灵媒 (ウタ) 可自由穿梭于阴阳两界，亡魂是历史记忆的载体。高岭刚借助这一本土文化资源，在影片中塑造了大量具有通灵特质的角色：《冲绳草莽英雄》中可解读梦境、沟通亡魂的母亲，《天堂秀色》中被吃掉肾脏后游荡于山野的雷秀，《梦幻琉球·鹤与亨利》中全身冒火的詹姆士。这些角色打破了生死的物理边界，让鬼魂在战场遗址、御岳 (琉球神道的祭

祀圣地) 等特定空间显现,本质上是对被日本官方历史话语抹除的战争创伤的强行召回。

值得注意的是,高岭刚大多采用客观的平视镜头,将被摄主体与背景并置为同一水平面的存在。这种看似“中立”的视角下,人、物与自然在画面中同时呈现。《冲绳草莽英雄》中,角色在森林、山川中的活动,将地下洞穴、林间平地、神灵栖居的树冠层纳入同一个垂直画框;《天堂秀色》中雷秀游荡山野的跟拍长镜头,通过纵深调度,将地下的原始村落、地面的稻田、高处的山巅串联起来。《梦幻琉球·鹤与亨利》则进一步突破时空限制,将叙事场景拓展到台湾、日本本土乃至美国,通过空中的美军飞机、“大象天线”(冷战信号接收设施)与南太平洋海域的呼应,构建了“空中霸权-陆地空间-海洋记忆”的垂直结构。

这种垂直空间的开拓,将神灵栖居的“高处”、亡灵徘徊的“低处”与凡人生活的“中间”叠加在一起,形成了立体的琉球宇宙观。其政治意涵在于:冲绳的历史真实,并非存在于日本官方叙事所规定的线性“现代化发展”水平面中,而是根植于来自本土传统深处与历史彼岸的垂直召唤。

2.2 异托邦地景:基地、甘蔗田与御岳的拼贴
日本主流电影常将冲绳简化为抽离历史与政治内涵的“舞台装置”[4],使其成为服务于本土观众猎奇心理的异域背景。而高岭刚则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像蒙太奇,将冲绳的异质空间进行不加过渡的拼贴,揭示了冲绳空间的混杂性与破碎性,打破了日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均质空间”想象。

福柯在《另类空间》中提出,异托邦是“在所有文化中真实存在的反场所……在其中,文化内部所有其他真实场所被同时呈现、争议和颠倒”[5]。高岭刚影像中的空间拼贴,正是冲绳异托邦现实的视觉呈现。在他的镜头中,美军基地的铁丝网、甘蔗田、御岳、混杂街市,被通过无技巧剪辑并置在一起。这些空间元素各自携带着无法调和的历史记忆:美军基地是日美双重军事霸权的物质载体,甘蔗田是日本殖民经济的产物,御岳则是琉球本土文化的根脉。

这种空间拼贴并非导演的奇观创造,而是通过剪辑将被霸权话语割裂的现实碎片重新缝合。《冲绳草莽英雄》中,琉球神话中的森林精灵奇吉木纳(Kijimuna)与主人公交流的场景,就发生在紧邻现代工业制糖厂的原生森林里。原始与现代、神圣与世俗的突兀并置,揭示了即便在日美霸权的全面笼罩下,冲绳本土文化依然以顽强的、幽灵般的方式在场。《天堂秀色》中,美军基地铁丝网、甘蔗田全景、御岳祭祀场景的连续蒙太奇,将军事霸权、殖民经济、本土信仰三个异质空间压缩在同一时空之中——这正是福柯所言“在一个真实场所中同时呈现多个本不可能共存的空间”的异托邦实践。

2.3 声音空间:方言作为听觉的抵抗壁垒

在高岭刚的电影中,声音是构建文化主体性、完成政治抵抗的核心场域。正如导演所言:“在我的电影中,某个出场人物肯定会说出‘冲绳独立’或‘琉球独立共和国’之类的台词,这种声音当然也代表了我的想法。”[6]这一宣言的深层意涵在于:语言从来不是中立的交流工具,而是意识形态权力的直接载体。在冲绳,日语的强制推广与本土琉球语(uchinā-

guchi)的边缘化,本质上是日本殖民化进程中“语言霸权”的核心体现。

冲绳的语言抵抗史,与其殖民史相伴始终。自17世纪琉球王国遭萨摩藩入侵起,语言记录便成为保存民族文化的方式:1613-1623年,琉球国王尚宁王以琉球语记录大量民歌与祭祀歌谣,编纂为《思草纸》;1879年“琉球处分”后,日本通过“方言札”强制推行标准日语,系统性消解琉球语的使用场景[7]。然而在影像领域,这一语言抵抗的脉络曾长期缺席——直到1985年,高岭刚在《天堂秀色》中第一次将琉球语大规模带入日本影坛。

高岭刚的声音政治通过层层递进的影像设计不断深化。《天堂秀色》中,导演要求所有主演学习并使用琉球语,标志着琉球民族在电影艺术中第一次以主体姿态讲述自身故事。《冲绳草莽英雄》的结尾则将语言的政治内涵推向极致:全片一直使用琉球语的制糖厂厂长西原,在用标准日语宣告“冲绳属于日本”后引爆炸药自杀——这一语言切换的瞬间,将语言选择背后生死攸关的政治抉择呈现在银幕上。《梦幻琉球·鹤与亨利》中,语言的混杂达到新的高度:日语、冲绳语、英语、闽南话在人物之间流转。尤为深刻的是,“大象天线”作为美军通信设施,同时接收着冲绳民谣、英语报道与中文《国际歌》,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的声音在此碰撞,象征冲绳被卷入多重历史进程的复杂处境。

通过这一层层递进的声音政治,高岭刚完成了双重使命:通过民族语言的持续使用,为本民族文化争取了“言说权”;通过声音的混杂并置,为冲绳历史争取了多重的“解释权”。

3 反叛的身体:抵抗诗学的寓言化书写

如果说空间化的记忆重构是高岭刚为冲绳历史搭建的“舞台”,那么其中活动的“身体”则是其抵抗诗学的核心载体。在日本主流影像中,冲绳人的身体始终被纳入两种刻板范式:要么是被同化的“国民身体”,要么是被奇观化的“异域身体”。而高岭刚则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反常的、荒诞的身体形象,以寓言化的方式承载冲绳的历史创伤,演绎一套拒绝同化、解构霸权的生存与反抗策略。

3.1 循环时间观与停滞的身体

与日本本土电影常见的社会发展、个人成长的线性叙事不同,高岭刚的电影呈现出循环、停滞甚至倒退的时间观,而人物的身体状态则与这种时间观形成同构。《天堂秀色》中的雷秀,在被猪吃掉肝脏后,如同行尸走肉般在琉球的山野与村庄中循环游荡,始终无法走出战争创伤的闭环;《冲绳草莽英雄》中的主角Girū,头上插着长枪却始终不死,身体处于生死之间的悬停状态;《梦幻琉球·鹤与亨利》中的詹姆斯,失忆后靠售卖身上永不熄灭的火焰为生,身体成为永恒的“后创伤”状态的载体。这些角色不再是传统叙事中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英雄”,而是承载着冲绳民族历史创伤的“症候性身体”。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停滞”的身体,并非对外部凝视的被动接受,而是一种主动的策略性抵抗。无论是日本主流叙事将冲绳纳入“现代化”进程的期待,还是西方/日本影像中将琉球固化为“前现代野蛮原始”的异域想象,都被高岭刚以

身体的“停滞”姿态一并拒绝。这些游荡的身体悬停在进步与原始的二元对立之间，占据了一个无法被任何单一霸权话语捕获的暧昧地带。这种悬置状态本身，就是一种主体性的宣示：冲绳既不是需要被日本“教化”的落后他者，也不是可供消费的古老异域，而是一个在殖民创伤后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的生命体。

这种循环时间与停滞的身体，构成了对日本主流社会所信奉的“现代化/进步”叙事的深刻拒绝。它以影像的方式揭示出：在被强行嵌入的、充满暴力与断裂的“现代性”进程中，冲绳从未获得真正的发展，而是陷入了永恒的“后创伤”循环。人物通过身体的“不作为”与“停滞”，保持了一种前现代的、未被完全同化的主体性。这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所言的“弱者的武器”[8]——以非线性的时间哲学、犬儒式的自我放逐，抗拒霸权叙事所规定的历史方向。

3.2 荒诞的英雄：作为“捣蛋鬼”的抵抗者

《冲绳草莽英雄》中的主角 Girū，并非传统意义上悲壮的革命英雄，而是一个典型的“捣蛋鬼”形象。他的力量源自森林之神 Kijimuna 的赐予，行为充满戏谑、偷盗、恶作剧的色彩。他假扮琉球民间故事中的侠盗运玉义留，但其反抗并非严密的组织行动，而是一场场即兴的、狂欢化的表演。

这种荒诞的英雄形象，本质上是巴赫金所言民间狂欢化文化的体现。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中指出，民间的狂欢化文化以戏谑、夸张、降格的方式，消解官方权威的神圣性与严肃性，在狂欢的瞬间，等级森严的权力秩序被暂时颠覆，底层民众获得了言说与反抗的空间[9]。Girū 的身体狂欢与恶作剧式反抗，正是冲绳琉球传统“毛遊”习俗的影像表达。面对日美双重霸权的强大国家机器，公开的、组织化的革命反抗几乎没有生存空间，而高岭刚则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这种“捣蛋鬼”式的民间抵抗合法化、影像化，为冲绳的底层抵抗找到了一种可行的美学表达方式。

3.3 混血身份：超越二元对立的“第三条路”

高岭刚的电影反复呈现“混血儿”或“边缘人”的形象，这既是冲绳现实人口构成的反映，更是一种超越日美二元对立、寻找“第三条路”的身份探索。《梦幻琉球·鹤与亨利》中剧情设计的戏中戏《拉布之恋》剧本中的詹姆士，作为冲绳—美国混血青年，其父亲是反美活动家，自身却在留美后被洗脑、失忆、遭遣返。影片结尾，他以燃烧之身道出独白：

“我原封不动地保留着重要的人生经历。我的出生没有得到过祝福。然而我现在的人生过得很有意义。我不相信把冲绳当作军事基地的美国，也不相信所谓的祖国日本。所谓的国家轻松地将我排斥在外并决定我的命运。我已经厌恶这个国家。我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日本人。也许我也算不上一个冲绳人。”

这段独白是整部影片的政治宣言。詹姆士并非在寻求一个确定的民族身份归属，而是坦然接受“不被任何国家祝福”的存在状态，并在这种漂泊中确立自我价值。这种“也许算不上一个冲绳人”的自白，恰恰最深刻地定义了何为冲绳主体性——它拒绝被任何本质主义的民族框架所捕获，而是在流动、杂糅与自我否定中不断生成。抵抗诗学的终点，并非建

立一个封闭的新国家，而是确立一种流动的、开放的、根植于海洋经验与创伤记忆的“琉球身份”。

4 祛魅与重构：魔幻现实主义作为方法的冲绳文化主体性建构

通过对空间、时间与身体的寓言化书写，高岭刚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像实践，最终指向一个核心目标：在文化表征的层面上，重构冲绳被霸权话语长期遮蔽的文化主体性。在日本主流的殖民话语中，冲绳始终被置于“他者”的位置，无法获得自我言说、自我定义的权利。而高岭刚则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完成了对本土文化符号的逆写、对琉球历史的后现代民族志建构，最终从日美霸权手中夺回了对冲绳文化的自我阐释权。

4.1 文化符号的逆写：“猪”意象的深层解码

冲绳的历史境遇使其文化认同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高岭刚通过挖掘“猪”这一深植于本土日常与信仰的核心意象，完成了对被殖民文化的有力反拨。在东亚“猪肉文化圈”中，琉球有着悠久的养猪传统[10]，这也成为近代以来日本本土歧视冲绳的刻板标签。日本本土长期未形成驯化饲养猪的习惯[11]，遂以“养猪”“吃猪肉”来标记冲绳的“野蛮落后”。20世纪初夏威夷日裔移民社区中流传的歧视性歌谣“おきなわけんけん、ぶた kau kau”（冲绳人，吃猪肉）[12]，正是这种文化等级论的生动注脚。

然而，高岭刚的策略是将这一被污名的符号回收、改造，并将其与琉球的文化基因深度绑定。在《冲绳草莽英雄》中，化身为少女 Marē 的猪不再是肮脏落后的象征，而是琉球文化精神中“Chirudai”（一种神圣的慵懒、与自然共生的状态）的化身[13]。她沉默、被动，被多方力量觊觎和争夺，恰似冲绳自身的命运。这种看似消极的姿态，正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是一种“弱者的武器”——以非暴力、不合作的生存哲学，拒绝被现代性的功利逻辑所同化[8]。Marē 的沉默与被动，并非无能，而是对自身被物化命运的一种消极对抗。通过对“猪”意象的复杂呈现，高岭刚完成了一次文化符号的“逆写”，将殖民者用以贬损的标签，转化为承载文化记忆与抵抗政治的核心隐喻。

4.2 后现代民族志的建构：政治批判的影像载体

高岭刚的电影超越了传统叙事电影的范畴，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实践，本质上构建了一部流动的、多声部的、影像化的后现代琉球民族志。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中提出的后现代民族志，拒绝权威的宏大叙事，强调多声部、对话性、反思性，以诗学的方式呈现边缘群体的真实经验[14]。高岭刚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像，正是这种后现代民族志理念的影像实践。

与传统民族志的线性史观不同，高岭刚的影像彻底打破了“过去—现在”的线性时间逻辑，战争、殖民、占领不再是已经完成的“过去式”，而是作为不断闪回、萦绕于当下的幽灵。他采用的环形叙事、梦境逻辑、多文本拼贴（新闻片段、超现实影像、戏剧排演、纪实素材），正对应了冲绳碎片化、被割裂的历史经验。《梦幻琉球·鹤与亨利》是这种后现代民族志的集大成之作。詹姆士的故事被嵌套在阿鹤与亨利寻找铭苣的框架中，而铭苣本人又在台湾研究蚂蚁的遗传基因——这些看似无关的线索共同编织成一张意义网络。导演不再追

求“历史的真实复刻”，而是通过对碎片的重组，召唤观众共同参与意义的生成。

后现代民族志的核心目的，不在于给出权威的历史结论，而在于激发一种“具有疗效的审美整合”。高岭刚影像中那些荒诞的魔幻情节——猪的化身、身体上永不熄灭的火焰、与亡魂对话的通灵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打破了观众被主流叙事固化的认知框架。意义的产生不再由导演单向灌输，而是在观众被激发的审美与智性活动中共同完成。通过这种方式，高岭刚的电影成为了一个让冲绳民众重新审视、对话并整合自身破碎历史的影像空间。

4.3 影像美学的革新：构建“冲绳本土 Cinema”

高岭刚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最终在影像美学层面实现了突破，构建出具有独立美学身份的“冲绳本土 Cinema”。其美学革新的核心在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彻底“本土化改造”：他将这一源于拉美文学的创作范式深度植入冲绳的万物有灵信仰与民俗传统之中，使影像中的“魔幻”不再是外来的艺术技巧，而是琉球文化的内生表达。

高岭刚的影像美学根植于一种难以被既有框架完全捕捉的私电影经验。其视觉语言既非“慢电影”的长镜头纪实美学所能充分涵盖，亦非符号学框架下的文化解码所能穷尽，在其 2016 年的作品《变鱼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更为有效的感知路径：放弃对线性逻辑的执念，转而进入一种情感上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的物质载体，正是高岭刚自早期“美术录像”实践以来所沉淀的复古录像艺术的物质质感，以及由此生发的先验性感知力。在先验视觉的统摄下，魔幻不再是被观看的奇观，而更多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方式：它作为琉球文化的叙事本体悄然在场，弥散于人物与亡魂的日常絮语、森林精灵与凡人的平静对视之间。高岭刚影像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其始终“突破了景观中的琉球风光”——将冲绳从观光符号与政治寓言的双重捕获中赎回，还原为一种唯有通过私电影方能触及的本原存在。

这一美学革新使高岭刚的作品与此前冲绳题材影像形成本质区别。先行者如新城卓在《冲绳少年》(1983) 中以写实笔触呈现“回归”后冲绳人的身份焦虑，东阳一在《冲绳列岛》(1969)、《温柔的日本人》(1971) 中聚焦冲绳的抗争史——二者虽开启了“冲绳视角”的先声，却仍未摆脱现实主义叙事的普遍性框架。而高岭刚的魔幻现实主义则实现了从“可置换的冲绳故事”到“不可置换的琉球表达”的跃迁：他的魔幻根植于冲绳本土信仰体系，是文化基因的自然显影，始终与冲绳的现实政治、本土文化直接绑定，具有明确的抵抗性与主体性建构目标。

5 结论

高岭刚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是冲绳独特历史境遇、文化断裂与政治诉求的集中影像表达。当现实本身因殖民、战争与霸权而变得荒诞断裂时，魔幻不再是逃避，而是“为了逼近真实而采用的必要方法”。他作品中的魔幻意象根植于本土信仰，通过对垂直空间的开拓、异质空间的拼贴，将线性的历史创伤重构为立体的、可感知的记忆场域；他通过对荒诞身体、循环时间与混杂身份的寓言化书写，演绎了一套拒绝同化、解构霸权的抵抗诗学；他通过对琉球语的坚持与多语言

的混杂，构建了听觉的抵抗壁垒，并最终通过影像将被剥夺的“阐释权”交还给冲绳自身。

需要指出的是，高岭刚电影的“抵抗性”并非没有边界。这些作品在日本本土的接受范围有限，其晦涩的影像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治效力的传播。然而，高岭刚的创作实践仍雄辩地证明，魔幻现实主义绝非固定的艺术范式，而是可以被本土文化深刻改造、为特定现实诉求服务的灵活美学工具。他成功地构建出一种“既属于冲绳又面向世界”的影像话语，让观众在荒诞的魔幻场景中，读懂冲绳的历史创伤、文化韧性与政治困境。对于所有处于文化夹缝中的地区而言，高岭刚的核心启示在于：唯有真正扎根本土、直面断裂的历史与现实，才能构建出具有独立主体性的艺术表达，在全球化与霸权叙事的双重压力下，守住自身的文化根脉与历史真相。

参考文献

1. Morris-Suzuki, Tessa. Discussion over the Meanings of "Post-colonialism"[A]. Gendai Shiso: Special issue: Post-War East Asia and the Presence of America[C]. 2001, 29(9): 183-187.
2. Ko, Mika. Takamine Go: a possible Okinawan cinema[J].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06, 7(1): 156-170.
3.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4. 郑炀. 战后日本电影的冲绳形象初探[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6(4): 101-106.
5. Foucault, Michel. Of Other Space[J]. Diacritics, 1986(16): 22-27.
6. 转引自 :[日]四方田犬彦. 创新激情 :1980年以后的日本电影[M]. 王众一, 汪晓志, 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 97.
7. 李甲. 语言政策与琉球语的衰亡[J].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2021(1): 62-73.
8. 詹姆斯·C·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M]. 郑广怀, 张敏, 何江穗,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9.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6卷[M]. 钱中文,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10. 王育洁. 对冲绳猪肉文化中猪肉祭祀的考察[J]. 怀化学院学报, 2017, 36(10): 17-20.
11. 王秀文. 日本“猪”民俗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J].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07(6): 108-111.
12. 洪舒. 20世纪上半叶夏威夷地区冲绳移民研究[D]. 成都: 四川大学, 2022.
13. Ma, R. Reminiscences of a journey to Okinawa: landscape film as essay, and Takamine Gō's Okinawan Dream Show (1974)[J]. Journal of Japanese and Korean Cinema, 2021, 13(1): 4-21.
14. 詹姆斯·克利福德, 乔治·E·马库斯.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 高丙中, 吴晓黎, 李霞,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引用本文：靖 周. 主流媒体赋能青年人才留驻的场景化创新实践——以扬州电台江都广播“青春交友”IP2.0 升级迭代为例[J]. 现代艺术与传播, 2026, 1(1): 16-19.

收稿日期：2026-06-30

主流媒体赋能青年人才留驻的场景化创新实践——以扬州电台江都广播“青春交友”IP2.0 升级迭代为例

靖 周

摘要：青年人才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与核心引擎，当前县域人才工作普遍存在“引才易、留才难”的结构性困境。相较于人才补贴、岗位供给等硬性引才举措，青年在城市的情感归属、社交配套、融入体验等软性服务，已然成为决定人才留存的关键因素。当代青年普遍存在社交圈层固化、业余生活单一、婚恋交友渠道狭窄等问题，这也是外来青年人才归属感薄弱、流失率偏高的重要隐性原因。作为本土主流权威媒体，扬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江都广播主动扛起主流媒体社会责任，紧扣区域人才发展战略，打破传统相亲交友“形式单一、场次零散、内容浅层”的1.0运营模式，迭代升级为场景化、常态化、品牌化、体系化的2.0青年交友IP“青春有约 智汇龙川”。通过搭建“线上日播节目常态化蓄水、线下固定阵地长效服务、节点主题活动品牌出圈”的三位一体运营体系，融合江畔灯光秀、露营市集、沉浸式音乐会、国风文化体验、文明婚恋宣讲、中式集体婚礼等多元新潮场景，将婚恋交友服务、青年关爱服务、精神文明培育、青年人才留驻、城市形象推介深度融合，有效破解青年交友难、融入难、扎根难的现实痛点，充分彰显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公共服务、社会赋能的核心价值，构建了县域主流媒体服务青年人才、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范式。

关键词：主流媒体；青年交友IP；场景化社交；人才留驻；媒体社会责任

一、引言

在区域人才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各地人才扶持政策趋于同质化，硬核政策的引才红利逐步收窄，以情感服务、生活配套、文化氛围为核心的软性营商与人居环境，成为城市吸纳和留住青年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作为工业强区、产业高地，集聚了大批船舶制造、高端装备、科创领域的青年技术人才，以及返乡创业青年、机关事业单位青年干部群体。但受工作模式限制，辖区青年普遍存在工作闭环化、社交圈层固化、课余生活单调等问题，优质、健康、同频的交友平台供给不足，导致外来青年难以深度融入城市，本土青年社交渠道匮乏，成为制约青年人才安居乐业、长期扎根发展的突出短板。传统相亲交友活动多为阶段性、仪式化的简单联谊活动，存在形式刻板、氛围拘谨、受众混杂、后续服务缺失等问题，既无法适配当代青年轻量化、沉浸式、兴趣化的社交需求，也难以承接政府“情感留人、服务留人、氛围留人”的人才工作核心目标。

地方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交通枢纽，随着数字化的不断深入也在不断地向服务型媒体转型。结合国家政策的号召与自身转型的需要，地方媒体入驻婚恋交友市场为单身群体服务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图景。地方媒体通过专业的传播技能不断地创新婚恋传播形式、丰富服务内容，尽可能地为单身群体提供多元、系统、完善的服务，成为了当前婚恋交友市场的新中介、新“媒人”。[1]主流媒体兼具官方公信力、全媒体传播矩阵、政企资源整合能力与专业活动策划优势，是补齐县域青年公共服务短板、助力人才留驻的核心主体。基于此，江都广播主动创新转型、突破固有模式，对传统相亲交友业态进行系统性重构，完成从单一联谊活动向全维度青

年服务IP的进阶升级，搭建起全年覆盖、线上线下联动、长效可持续发展的青年交友服务体系。

二、模式迭代：从1.0传统联谊到2.0体系化IP的核心升级

传统相亲1.0模式以室内座谈、自我介绍、简单互动为主要形式，存在场景单一、内容枯燥、受众宽泛、公益属性弱化、品牌辨识度低、服务短期化等诸多弊端，仅能实现基础交友功能，缺乏人才赋能、文明培育、城市服务等深层社会价值。立足主流媒体使命与当代青年多元需求，江都广播对交友服务模式进行全方位迭代升级，打造相亲交友2.0进阶体系，实现四大维度的根本性提质升级。

（一）、场景迭代，从封闭室内转向全域沉浸式场景。摒弃传统会议室、商超联谊模式，依托江都江景、城市公园、工业地标、乡镇阵地、文旅空间，打造江畔夜游、露营市集、灯光秀展演、主题音乐会、国风康养、户外公益相亲角等多元年轻化场景，贴合当代青年审美与社交习惯，消解传统相亲的尴尬拘谨，打造松弛、浪漫、高品质的社交体验。

（二）、内容迭代，从单一相亲转向多元价值融合。趣缘关系是以相同或相近的兴趣为纽带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跳出“单纯找对象”的浅层定位，将文明婚俗倡导、传统文化传承、青年思想引领、反诈普法科普、身心健康服务、人才政策宣讲融入各类活动，实现一场活动、多重赋能，让青年交友兼具温度、深度与厚度。

（三）、受众迭代，从泛大众流量转向精准人才服务。聚焦全区产业青年、高学历人才、企业骨干、返乡青年、“新江都人”，定向精准招募、分层分类开展专场活动，精准对接政

府、企业留才需求,解决青年人才社交断层、城市融入困难的核心痛点。

(四)、运营迭代,从零散活动转向三位一体长效体系。构建线上日播节目常态化蓄水、线下固定相亲角日常服务、节点主题活动品牌拔高的完整闭环,彻底破解传统活动“办一场、停一阵”的短期化弊端,实现青年交友服务全年不落幕、时时可参与。

三、体系构建:江都广播青年交友 IP2.0 立体化实践路径

(一)、线上常态化日播阵地:《缘来是你》每日电波护航

江都广播夯实线上青年服务核心底座,打造本土独家常态化公益相亲日播节目《缘来是你》,固定每日中午 12:30—13:30 黄金时段准时播出,全年不间断为本地单身青年提供公益电波交友服务,构建起“每日一小时、全城牵良缘”的长效婚恋服务体系。节目始终坚守主流媒体公益属性,摒弃商业婚恋平台流量变现、过度营销、功利引流的运营弊端,聚焦优质单身青年资源归集、婚恋观念正向引导、青年情感问题解答、正规交友渠道拓展四大核心职能。

节目常态化征集机关事业单位、科创企业、产业链重点企业、教育医疗系统、返乡创业群体等优质单身资源,通过电波自我介绍、嘉宾专访、婚恋理念交流、新风科普宣讲等多元形式,为单身男女搭建零门槛、高公信、全覆盖的云端交友平台。同时依托融媒体全媒体矩阵,开通线上报名、资料公示、远程牵线、咨询答疑等配套服务,实现线上资源持续蓄水、精准匹配、长效跟进。节目日常传播中持续植入文明婚恋理念,倡导简约婚恋、真诚择偶,常态化抵制高价彩礼、恶俗婚闹、婚恋攀比等陈规陋习,以润物无声的传播方式,引导青年树立真诚纯粹、勤俭向善、两情相悦的新时代婚恋观,为线下各类交友活动筑牢思想根基与资源储备。

(二)、线下常态化固定阵地:源头公园相亲角全天候赋能

依托线上《缘来是你》节目积累的青年资源,江都广播落地实体化线下服务阵地,补齐常态化服务短板。2025 年 5 月 3 日,江都广播在江都南水北调源头公园成功举办“守护江都情缘·邂逅幸福源头”青年交友联谊会,同步正式揭牌启用源头公园相亲角,标志着辖区青年交友服务从节点化集中举办,迈向日常化、常态化持续供给的全新阶段。

该常态化阵地以传播婚俗新风为核心引领,聚焦各行各业优质单身青年,打造同频、高质、纯粹的青年社交圈层。现场设置轻量化趣味破冰互动环节,打破青年社交隔阂,助力参与者快速熟悉、轻松交流;同时配备专业情感咨询师、公益红娘志愿者全程驻场,提供免费择偶指导、情感疏导、精准匹配等公益服务。阵地集中展示千余条全国优质征婚信息,拓宽青年交友选择范围。依托源头公园城市文旅地标优势,将城市休闲公共空间转化为青年专属服务阵地,与线上《缘来是你》节目形成双向联动、互补赋能,构建“线上日日蓄水引流、线下时时结缘交友”的常态化服务新格局。

(三)、节点化品牌主题活动:多点布局打造现象级青年 IP

依托线上线下常态化服务阵地的资源积淀,江都广播紧扣传统节日、青年节点、城市特色,全年梯度化布局系列品牌主题活动,构建层次丰富、特色鲜明、口碑优质的“青春有约 智汇龙川”青年交友 IP 矩阵,实现“季季有主题、节节有活动、场场有亮点”的常态化活动格局。

1.聚焦产业特色,打造产业链专属交友活动,赋能产业人才扎根发展。2023 年江都区青年人才交友会以“链之爱”为专属主题,深度贴合江都船舶主导产业特色,联合区委组织部、区科技局、区人社局等多部门协同发力,落地大桥镇中远海运重工工业地标。活动创新打造江畔沉浸式社交场景,融合江畔灯光秀、露营市集、梦幻音乐会、江边夜游、趣味团队派对等年轻化潮流元素,彻底打破传统相亲的拘谨刻板氛围。活动同步开展人才政策宣讲,系统解读全区人才政策 3.0 体系、1 亿元人才专项配套资金、人才公寓建设、各类青年专项补贴等硬核保障举措,让产业青年在轻松交友的同时,深度感知城市温度、全面了解人才红利,推动产业链、人才链、生活链深度融合,助力产业人才安心扎根。

2.依托传统七夕节点,深耕婚俗改革阵地,打造文明交友品牌。举办“爱在七夕 幸福‘益’夏”文明相亲会,以移风易俗、弘扬婚俗新风为核心主旨,组织在场青年集中学习抵制低俗婚闹、高价彩礼倡议书,并集体签名承诺。通过轻松的趣味互动、真诚的交流畅谈,引导广大青年坚守人品为先、情感为本的纯粹择偶理念,自觉摒弃大操大办、高价彩礼、低俗婚闹等婚嫁陋习,以青年群体的新风正气涵养社会文明风尚。

3.立足中秋传统佳节,创新打造国风康养交友场景。开展“真武油乡青苗国医养生局”主题活动,将传统中医药文化、青年健康服务、反诈普法宣传与青年交友联谊深度融合。通过中药香囊 DIY、专业中医体质辨识、艾灸理疗体验、杏林药谜探秘、反诈主题养生茶饮互动等特色环节,贴合当代青年养生减压、健康生活的新需求,让青年交友不再局限于婚恋结缘,同时实现传统文化浸润、身心健康守护、安全知识普及的多重价值。

4.聚焦五四青年节点,打造红色音乐交友活动,凝聚青年奋斗共识。举办百人规模新青年音乐节,组织 120 名各行各业青年现场临时组队、限时排练、同台展演,唱响红色金曲与时代赞歌。在沉浸式文艺展演中厚植青年家国情怀,引导青年树立“与城市共成长、与时代同奋进”的奋斗理念,以青春之声汇聚助力区域发展的磅礴力量。

5.升级品牌标杆活动,举办中式集体婚礼,拔高人才留驻品牌高度。打造江都区首届“智汇龙川 姻为有你”青年人才集体婚礼,汇聚 18 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人才新人,身着新中式礼服,遵循传统礼仪缔结良缘。活动邀请各级领导、全国五好家庭代表、优秀企业代表共同见证,全方位展示江都优厚的人才政策、完善的安居配套、暖心的城市服务,让众多外来“新江都人”在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中扎根龙川、建功江都。

四、实践成效：媒体 IP 升级的多重价值赋能

(一)、坚守媒体初心，彰显主流舆论担当

江都广播青年交友 IP 始终坚守公益属性、主流导向、服务本位，与商业婚恋平台流量化、娱乐化、功利化的运营模式形成鲜明区别。通过日常节目常态化舆论引导、线下活动沉浸式场景浸润，持续传播文明婚恋新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婚俗移风易俗工作，有效补齐县域青年精神文化服务短板，充分彰显了本土主流媒体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核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这是新型主流媒体对商业逻辑的破壁重构——用公益属性破解信任危机，用文化赋能替代功利导向，用场景再造升级传统相亲交友。[3]

(二)、破解留才难题，构建情感留人闭环

各地人才硬核政策主要解决青年就业立业、创业发展的核心需求，而媒体打造的暖心社交服务，精准补齐了青年立身、安家、安心的软性需求。通过线上线下立体化、常态化的青年交友服务，有效拓宽青年人才社交圈层，消解外来青年的异乡疏离感，搭建稳固的城市情感归属纽带，切实破解企业青年人才交友难、城市融入难、长期扎根难的现实痛点，构建起“政策留人+服务留人+情感留人”的完整留才闭环，为区域人才集聚、青年留存提供坚实的柔性支撑。

(三)、塑造独家 IP，提升媒体核心竞争力

通过从 1.0 传统联谊到 2.0 体系化 IP 的全方位迭代升级，江都广播成功打造出差异化、特色化、体系化的独家青年服务品牌“青春有约 智汇龙川”。日播节目持续蓄水引流、固定阵地常态服务兜底、主题活动品牌出圈赋能，三位一体的创新运营模式，彻底摆脱了传统相亲活动零散化、低端化的标签，打造出高辨识度、高公信力、高美誉度的媒体特色服务名片，显著提升了江都广播的社会影响力、群众认可度与核心竞争力。

(四)、涵养城市气质，助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系列特色青年交友活动深度整合江都区域文旅、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文明创建各类资源，全方位展现江都宜居、宜业、宜青春、宜奋斗的城市特质，持续优化本地青年发展生态，厚植城市青春活力与人文气质，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创新活力。

五、现存短板与发展瓶颈

总体来看，江都广播青年交友 IP 已构建“线上+线下、日常+节点”的立体化服务体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品牌效应。但结合青年人才多元化需求与品牌长效运营视角来看，IP 建设仍存在三方面结构性短板，制约服务质效进一步提升。

(一)、精准化分层服务体系尚不健全，人才专属适配度有待提升。当前活动以通用性青年社交为主，对高层次人才、产业骨干、外地来江青年等重点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挖掘不够深入，尚未完全实现“分行业、分学历、分年龄、分圈层”的精细化专场运营。大众化参与模式容易造成圈层匹配度不

高、同频度不足，难以充分满足优质青年人才高品质、高匹配度的社交诉求，服务精准度仍有提升空间。

(二)、服务链条偏短期，长效续缘机制存在断点。目前品牌呈现“节目日常蓄水、活动集中爆发、现场氛围热烈、后续跟进薄弱”的特点。线上节目资源沉淀、线下活动意向对接、后期跟踪回访、长期牵线续缘的闭环体系尚未完全打通，存在“活动结束后即服务终止”的阶段性问题，导致部分优质交友资源未能充分转化，整体牵手转化率、长效服务率有待提高。

(三)、政企联动深度不足，产业赋能力度偏弱。现阶段活动多由媒体牵头、部门配合开展，企业主动参与、深度联动的常态化机制尚未完全成型。针对园区企业、重点产业链青年员工的定制化专场活动偏少，面向企业青年人才的上门式、嵌入式、沉浸式服务供给不足，媒体服务与企业留才需求未能完全同频共振，IP 赋能产业留人、企业稳才的效能未完全释放。

(四)、品牌宣传侧重活动呈现，价值传播深度不足。现有传播多聚焦活动场面、氛围展示，对“媒体服务人才、温情助力留才、婚恋新风涵养城市文明”的深层价值挖掘不够，对青年扎根、城市共成长的典型案例、成长故事、暖心成果宣传偏少，“青春有约 智汇龙川”IP 的社会价值、治理价值、人才价值传播力度有待进一步深化。

六、优化路径与提升对策

针对以上短板，结合媒体 IP 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高质量服务、城市青年生态建设要求，下一步将从精准化、长效化、产业化、品牌化四个维度持续迭代升级，推动交友 IP 从“活动型品牌”向“治理型、服务型、长效型”综合青年服务品牌进阶。

(一)、细化圈层分类，打造精准化人才专属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招募机制与活动体系，分层分类开设“高层次人才专场、产业链青年专场、新江都人专场、青年干部专场”，严格优化人员结构、提升圈层匹配度。依托节目常年数据积淀，建立青年人才信息台账，通过兴趣标签、职业圈层、婚恋诉求、定居意愿进行精细化筛选匹配，真正实现“同频交友、同质交流、同向成长”，提升优质青年人才参与体验与匹配实效。

(二)、完善闭环服务，构建全周期长效续缘机制。打通“线上节目储备—线下阵地匹配—活动现场破冰—后期跟踪回访—常态化续缘联谊”全链条服务链路。组建公益红娘+情感导师常态化服务队伍，对活动意向青年进行一对一跟进、定期回访，常态化开展小型续缘沙龙、轻社交复盘活动，打破“单次活动、单次服务”的局限，实现资源长效利用、服务持续跟进、缘分持续沉淀，全面提升 IP 成功率与用户粘性。

(三)、深化政企协同，推动 IP 深度赋能产业留才。建立区委人才办、园区、重点企业、团委妇联、媒体常态化联动机制，推行“企业点单、媒体接单、部门站台”的定制化服务模式。主动走进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开展专场联谊活动，将交友服务、政策宣讲、城市推介、权益科普直接送到青年职

场一线，让青年人才就近参与、就近交友、就近融入，真正把交友 IP 打造成为企业稳人才、城市留青年的柔性抓手。

(四)、深化价值传播，升级品牌叙事与城市赋能能级。转变宣传思路，从“报道活动”转向“传播城市温度、讲好留才故事、弘扬文明新风”。深度挖掘青年结缘、扎根江都、立业成家的典型案例，通过融媒体深度报道、专题访谈、系列推文，立体呈现媒体服务青年、助力人才留存、涵养城市文明的深层价值，持续放大 IP 公信力、影响力、美誉度，助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五)、迭代场景创新，持续领跑县域媒体 IP2.0 标杆。持续迭代沉浸式、年轻化、分主题特色社交场景，深度融合江都本土文旅地标、传统民俗节点与当代青年兴趣偏好，拓展户外徒步、龙舟民俗团建、实景剧本推理、环湖骑行、国风雅集、露营音乐会、非遗手作等多元轻社交业态，不断丰富活动载体、创新互动形式，长久维系品牌新鲜感、青年吸引力与圈层活力，着力打造一套可持续运营、可复制落地、可全域推广的县域主流媒体青年综合服务标杆 IP。

七、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主流媒体早已突破单一舆论宣传的传统职能，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供给、城市品牌塑造与人才队伍建设。扬州电台江都广播通过相亲交友 IP 从传统联谊 1.0 向场景化体系 2.0 的跨越式升级，构建起“日播节目常态化打底、固定阵地长效化兜底、主题活动品牌化拔高”的三维立体服务体系。以青年社交服务为切入点，以文明婚恋新风为内核，以人才留驻发展为最终目标，用媒体温度凝聚青年、留住人才，用文化浸润涵养城市文明，用品牌创新赋能区域发展。这一创新实践，有效破解了县域青年交友难、人才扎根难、文明培育难的多重现实难题，为县域主流媒体创新履职、服务青年成长、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参考文献

张家芝. 地方媒体相亲平台中的婚恋关系建构与运作逻辑研究 —— 以《都市放心爱》平台为例 [D]. 江西财经大学, 2024.

谢玉进. 论网络趣缘关系[J]. 重庆社会科学, 2007, (03): 115-118.

1. 陈曦. 以公益相亲重构青年社交新图景 [N]. 佛山日报, 2024-05-20 (07).

引用本文：双双 周.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实践路径与价值升维——基于扬州新闻广播四篇民生监督报道的案例分析[J]. 现代艺术与传播, 2026, 1(1): 20-23.
收稿日期：2026-06-30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实践路径与价值升维——基于扬州新闻广播四篇民生监督报道的案例分析

双双 周

摘要：在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舆论监督报道正经历从“曝光”向“建设性治理”的范式转型。本文以扬州新闻广播四篇民生监督报道为研究样本，其中重点剖析获江苏省优秀广播新闻节目专题二等奖的《八旬老人“人户分离”养老困局调查》，结合《消失的档案》《收费存疑引不满》《同药不同价》三篇日常监督稿件，探讨一线民生记者如何通过“个案切入—系统追问—协同破局”的操作路径，实现舆论监督从解决单一问题到推动制度优化的价值升维。研究发现，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核心在于以问题为导向，以协同为手段，以制度完善为目标，通过媒体、公众与职能部门的三方互动，构建“曝光—整改—机制完善”的治理闭环。本文进一步提炼出“民生痛点精准捕捉”“跨域协同调查机制”“政策传导梗阻诊断”“治理方案共建共享”四大实践策略，为新时代主流媒体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建设性舆论监督；民生报道；社会治理；政策梗阻；媒体角色

一、引言：舆论监督的时代命题与范式转型

舆论监督作为新闻媒体的核心职能之一，长期以来在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众权益、推动政策完善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然而，在传统监督报道中，“曝光—问责—整改”的线性模式往往聚焦于个案解决，对问题背后的系统性、结构性矛盾关注不足，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重复性问题频发。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公众对媒体的期待已从“问题揭露者”转向“解决方案推动者”，这要求舆论监督报道必须实现从“破坏性批判”到“建设性建构”的范式转型。

建设性新闻理念强调，新闻报道应在揭示问题的同时，聚焦解决方案，促进社会对话，推动积极变革。这一理念与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为新时代舆论监督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2]

扬州市新闻广播《12345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以政务热线海量群众诉求为线索库，常态化产出民生调查监督广播作品。本文基于四篇民生监督报道的实践，重点分析《八旬老人“人户分离”养老困局调查》如何通过个案调查撬动全市养老服务政策统一，探讨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操作逻辑、实践策略与价值实现路径，以期为一线记者提升监督报道的治理效能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从“第四权力”到“治理伙伴”——舆论监督研究的理论演进

（一）传统舆论监督：权力制衡与问题揭露

西方新闻理论中，舆论监督被视为“第四权力”，核心功能是对公权力进行制衡。[3]我国新闻学界早期研究多聚焦于监督的“批判性”与“揭露性”，强调媒体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角色，通过曝光腐败、不公等现象维护公共利益。这一阶段

的监督报道以“事件驱动”为主，注重时效性与冲击力，但往往止步于个案解决，缺乏对制度性根源的深度挖掘。

（二）建设性新闻：从批判到建构的范式转型

21世纪初，建设性新闻理念在北欧兴起，主张新闻报道应“不仅告诉人们世界发生了什么，还要告诉人们世界可以变得更好”。[4]国内学者将其引入后，结合本土实践提出“建设性舆论监督”概念，强调监督报道需具备“问题意识、解决方案意识、协同意识”，通过搭建对话平台、推动多方协作，实现从“破”到“立”的转变。[5]相关研究表明，建设性监督报道能更有效促进政策优化与社会共识形成。

（三）媒体参与社会治理：角色重构与路径创新

随着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媒体被视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为新时代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6]学者指出，媒体可通过“议题设置—民意聚合—政策反馈—效果评估”的闭环，深度嵌入治理过程。

民生监督报道作为媒体参与治理的重要抓手，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具体问题，更在于通过个案折射系统性矛盾，推动制度完善。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理论探讨，对一线记者的具体操作策略关注不足，本文试图通过案例分析填补这一空白。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四维操作模型”

本文基于四篇报道的实践，构建“建设性舆论监督四维操作模型”，作为分析框架：

1. 民生痛点精准捕捉 :从公众急难愁盼的个案切入 ,确保监督议题的公共性与紧迫性 ;
2. 跨域协同调查机制 :突破单一部门局限 ,通过多源求证、跨层级采访还原问题全貌 ;
3. 政策传导梗阻诊断 :从个案表象深入制度层面 ,诊断政策执行中的“中梗阻”与“末梢堵塞” ;
4. 治理方案共建共享 :联合职能部门、专家学者、公众共同探索解决方案 ,推动制度优化。

研究方法采用案例分析法 ,以《八旬老人“人户分离”养老困局调查》为核心样本 ,结合其他三篇报道的辅助材料 ,通过文本分析、过程追踪 ,还原监督报道的操作流程与治理效果 ,提炼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表 1. 新闻报道四例要素情况一览			
作品名称	监督层级	核心治理成效	四力完整度
《八旬老人“人户分离”养老困局调查》	全域制度型	多地同步调整政策 ,全市出台统一居家养老实施文件 ,实现全市养老服务全域畅通	四力完整
《消失的档案》	个体维权型	协助当事人找到工作档案 ,仅梳理个人查询路径 ,无行业整改	脚力、笔力完备 ,脑力、眼力挖掘不足
《收费存疑引不满》	矛盾调解型	协调业主、物业、住建三方现场对账 ,化解单一业主收费纠纷	缺少共性问题深挖
《同药不同价 药店“隐形处方费”调查》	行业提醒型	涉事药店约谈整改 ,仅发布行业消费提示 ,无市场监管全域规范	调查范围局限 ,未挖掘行业监管漏洞

四、主体论证 :从个案到系统——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实践路径

(一) 民生痛点精准捕捉 :以“小切口”折射“大民生”

节目热线每日汇聚海量群众诉求 ,投诉内容涵盖邻里矛盾、消费纠纷、办事难题、政策执行冲突等多种类型 ,并非所有工单都适合深度建设性监督。记者的核心眼力 ,在于区分“单点个体矛盾”与“系统性政策梗阻”两类线索 ,分层定位报道层级。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起点 ,是精准捕捉具有普遍性的民生痛点。四篇报道均从个体诉求切入 ,但背后关联着群体性权益 :

1. 《八旬老人“人户分离”养老困局调查》中 ,杨先生因户籍与居住地分离无法享受居家养老服务 ,看似个案 ,实则折射出扬州市各县 (市、区)政策执行不统一的系统性问题。记者通过老人“爬楼困难”“类风湿关节炎”等细节 ,强化议题的民生温度 ,引发公众共情 ;

2. 《消失的档案》中 ,朱女士退休档案缺失直接影响退休待遇 ,记者从其“模糊记忆碎片”出发 ,挖掘出破产集体企业职工档案管理的普遍漏洞 ;
3. 《收费存疑引不满》聚焦恒温恒氧小区物业收费不透明 ,通过史女士的投诉 ,揭示科技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的行业性矛盾 ;
4. 《同药不同价》中 ,袁先生遭遇的“隐形处方费” ,看似个别药店行为 ,实则反映基层药店服务中价格公示不规范的治理短板。

这些案例表明 ,一线记者需具备“从个体见群体、从现象见本质”的洞察力 ,将个案转化为具有公共价值的监督议题。

(二) 跨域协同调查机制 :打破信息壁垒 ,还原问题全貌

建设性监督报道的核心在于“调查的深度”与“信源的多元”。四篇报道均突破了单一部门采访的局限 ,构建了跨层级、跨领域的协同调查网络 :

1. 在养老困局调查中 ,记者先后采访邗江区、仪征市民政局 ,对比两地政策差异 ;进一步扩展至高邮、宝应等地 ,发现“主城区落实较好 ,县域存在梗阻”的规律 ;同时引入市委党校专家 ,从行政壁垒、财政机制、服务理念三个维度诊断问题根源 ;
2. 《消失的档案》中 ,记者从市直就业中心到区托管中心 ,再到街道办 ,排查多个部门 ,最终通过“电子玩具厂为苏扬玩具总公司分厂”的关键信息锁定档案去向 ;
3. 《收费存疑引不满》联合住建、市场监管部门现场对账 ,厘清“合同约定、单独列账”的政策边界 ;
4. 《同药不同价》暗访市区多家药店 ,对比不同付款方式的价格差异 ,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现场核查收费记录 ,确认“价格公示不到位”的核心问题。

这种“多源求证、交叉验证”的调查机制 ,既确保了报道的真实性 ,又为后续解决方案提供了扎实的事实基础。

(三) 政策传导梗阻诊断 :从“执行偏差”到“制度缺陷”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深度 ,体现在对问题根源的制度性诊断。四篇报道均未止步于“曝光问题” ,而是深入分析政策执行中的梗阻点 :

1. 养老困局报道中 ,记者发现仪征市“政策梗阻”的根源在于“本级财政出钱”的预算限制 ,以及“数据孤岛”导致的重复享受风险 ;高邮、宝应等地则因“协调机制缺失”“怕担责”而执行不力。这些发现直指行政碎片化、财政机制僵化等系统性矛盾 ;
2. 《消失的档案》揭示破产企业职工档案管理“责任主体模糊”“历史数据缺失”的制度漏洞 ;
3. 《收费存疑引不满》指出科技住宅收费“合同约定不明确”“部门监管缺位”的行业痛点 ;
4. 《同药不同价》发现基层药店“价格公示不规范”“服务告知不到位”的经营疏漏 ,以及监管部门“日常巡查覆盖不足”的治理短板。

通过制度性诊断 ,报道将个案问题上升为公共政策议题 ,为职能部门整改提供了明确方向。

(四) 治理方案共建共享 :推动“曝光—整改—机制完善”闭环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落脚点,是推动问题的系统性解决。四篇报道均通过媒体、部门、公众的协同,构建了治理闭环:

1. 养老困局报道中,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市民政局后,仪征市迅速整改,为杨先生办理服务,随后市民政局下发文件,统一全市政策,实现“全域畅通”;高邮、宝应等地跟进调整,最终形成跨区域协调机制。专家提出的“钱随人走”“智慧养老平台”等建议,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养老服务提供了参考;
2. 《消失的档案》梳理出“破产企业职工档案查找路径”,为同类群体提供可复制的求助指南;
3. 《收费存疑引不满》推动物业“规范履职”、业主“理性维权”、部门“强化监管”的三方共治方案;
4. 《同药不同价》促使市场监管部门要求药店“明码标价”“事前告知”,并开展全镇摸排,杜绝模糊定价。

建设性监督区别于普通投诉报道的核心,是不只停留在“谁做错事”的表层,而是依托脑力深挖矛盾背后行政、财政、机制层面结构性问题,实现个案上升至全域治理议题。这些实践表明,媒体不仅是“监督者”,更是“治理伙伴”,通过搭建对话平台、凝聚共识,推动制度优化与治理升级。

五、讨论:建设性舆论监督的价值升维与风险规避

(一) 价值升维:从“解决问题”到“完善制度”

四篇报道的实践表明,建设性舆论监督实现了三重价值升维:

1. 个体权益到群体福祉:从解决杨先生的养老服务,到推动全市“人户分离”老人政策统一;从帮助朱女士找到档案,到为破产企业职工提供查询路径;
2. 从个案整改到制度完善的治理升级。建设性监督的核心在于“以问题倒逼改革”。如彻底解决高龄老人持续数月的办事难题,保障老年群体基本养老权益,消除扬州各区县养老政策差异化壁垒,惠及全市跨区域居住高龄群体;治理参考价值,报道剖析的财政分灶、行政碎片化、政务数据孤岛等问题,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跨区域民生服务协同提供地市实操样本,具备可复制借鉴意义。此类实践表明,监督报道正成为政策迭代的重要触发点,推动治理体系精细化、法治化。
3. 从媒体监督到治理协同的范式转型。传统监督常以媒体“单打独斗”为主,而建设性监督强调构建“媒体+政府+专家+公众”的协同网络。这种“媒体搭台、多方共治”的模式,不仅提升了问题解决的效率,更重塑了社会治理的生态,使监督从“对立式曝光”转向“共建式治理”。
4. 上述价值升维的背后,是媒体角色从“旁观者”到“建设者”的深度转变。通过将个案置于公共治理框架下审视,监督报道正成为撬动制度创新的杠杆,推动社会治理从“碎片化修补”迈向“系统化优化”。这种转型不仅回应了公众对高质量监督的期待,更为媒体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可行路径。

(二) 风险规避:坚守边界,避免“越位”与“失位”

建设性监督报道需警惕两种风险:

1. 越位风险:媒体不能替代职能部门履职,需坚守“监督者”而非“执行者”角色。如养老困局中,记者仅反馈问题、推动协调,具体整改由民政部门落实;
2. 失位风险:不能因追求“建设性”而弱化监督锋芒。如《同药不同价》中,记者明确点出药店“经营不规范”、监管部门“巡查不足”,保持批判性底色。

一线记者需把握“到位不越位、监督不替代”的原则,在推动问题解决的同时,维护媒体的独立性与公信力。

六、结论:构建“问题导向—协同治理—制度完善”的监督新生态

本文通过四篇民生监督报道的案例分析,系统揭示了建设性舆论监督从“个案破局”到“系统重塑”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新时代舆论监督的核心价值在于:以民生痛点为切入点,以跨域协同为手段,以制度完善为目标,通过媒体、公众、职能部门的三方互动,构建“曝光—整改—机制完善”的治理闭环。在此过程中,媒体、公众与政府职能部门形成“曝光—整改—机制优化”的治理闭环,实现了从“问题揭露者”到“治理参与者”的角色升维。这一转型不仅回应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主流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责任担当,也从舆论监督中提升了公众满意度。

对一线记者而言,提升建设性监督能力需锻造“三重素养”:一是民生洞察力,即从个体困境中提炼普遍性议题的能力。如养老报道中,记者从八旬老人的个案困境,敏锐捕捉到“人户分离”政策落地的普遍性梗阻,为后续制度优化奠定基础;二是系统思维力,要求记者超越表象,透视问题背后的制度性根源。例如,在“同药不同价”报道中,记者通过药价差异现象,深入剖析医保政策执行中的区域标准差异,为政策统一提供了决策依据;三是协同推动力,强调联合多方共建解决方案。在“收费存疑引不满”调查中,媒体搭建沟通平台,促成物价、住建、物业等多部门协商,最终形成规范化收费细则,实现了从“单一曝光”到“多元共治”的转变。

面向未来,舆论监督需在“深度”与“广度”上持续突破。一方面,要深化“建设性”内涵,推动监督报道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完善一类制度”升级,通过个案调查触发政策修订或实施细则出台;另一方面,要拓展“协同”维度,从区域治理向跨区域协同治理延伸,借助数字化手段打通数据壁垒,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联动机制。在此过程中,媒体应主动嵌入社会治理体系,成为连接民意与政策、问题与解决方案的枢纽,以高质量的监督报道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真正实现舆论监督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李良荣. 新闻学概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156-162. [2] 陈力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89-95.

[3] Carlyle T.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M]. London: James Fraser, 1840. [4] 王辰瑶. 建设性新闻: 一种新的新闻范式?[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5): 6-25. [5] 周勇, 黄雅兰. 从“批判”到“建设”: 舆论监督的范式转型[J]. 现代传播, 2021, 43(3): 45-51. [6]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人民网 2016 年 02 月 20 日.

(注: 文中案例细节均基于扬州市新闻传媒中心内部报道材料, 部分政策背景参考了扬州市民政局、市场监管局公开文件,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 部分姓名已做化名处理。)

现代艺术与传播

第 1 卷第 1 期 (2026)

2026 第 1 卷第 1 期

https://www.bsjn.com/jmac/zh_Hans

jmac-editor@bsjn.com

现代艺术与传播

欢迎访问期刊网站获取最新论文与投稿信息